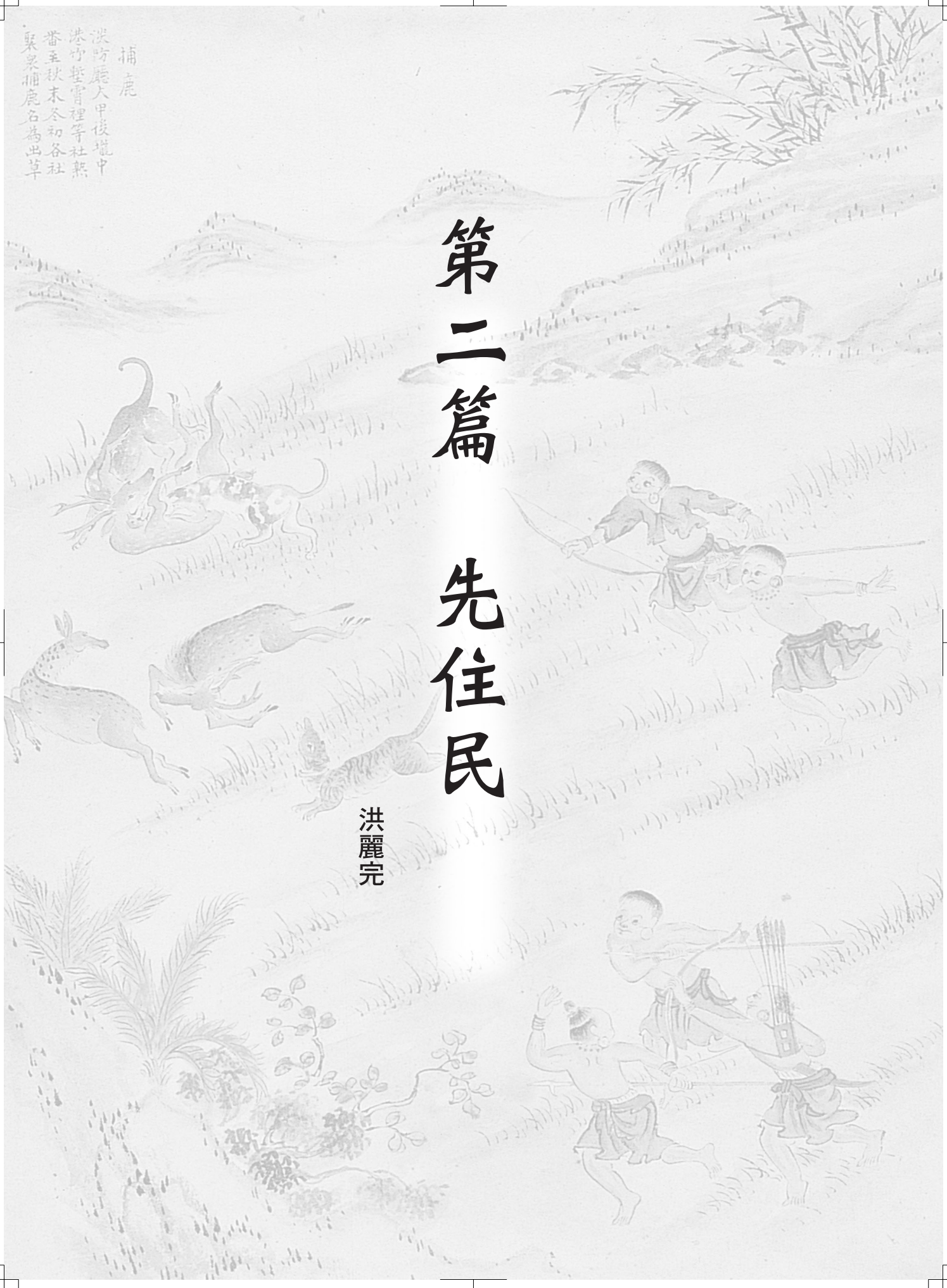
扉頁.tpf-1 5/4/2004 21:56:42



第二篇 先住民

洪麗完

先住民篇.tpf-1 7/9/2004 11:14:41

本鄉現住民以漢人佔大多數，然而漢人定居以前，境內早已有先住民居於其間；歷史初期本鄉境域主要為大甲東社的活動地，鐵砧山附近一小部份地方則為大甲西社社域範圍。此外，更有較他們早來的史前人類。本篇主要敘述臺灣史前文化狀況、主要土著部落大甲東社的社經文化暨其變遷過程，其中亦包括土著與漢人移民關係的演進、土著的遷移活動，以及其現況。

第七章　史前文化與土著部落

第一節　史前文化

依據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顯示，距今三—五萬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時代晚期，臺灣已有人類居住。冰河時代結束，海水上漲形成臺灣海峽以後（約西元前八千年），除了舊石器時代的人群仍舊遨遊於島嶼臺灣外，距今六千年前，另一群已知製造陶器並經營初級山田燒墾農業的人群，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抵達、定居（也有可能分批而來），考古學者稱此新文化為大坌坑文化。他們（與亞洲大陸東南沿海人群）的生活方式，如頻繁的遷居行為、山田燒墾並從事狩獵、漁撈與採集野生植物的種子、植物纖維，也種植根莖類作物，和熱帶與亞熱帶沿海密切相關；故常被視為南島系民族（Austronesian 或稱 Malayopolynesian）的祖先所留下的文化。換言之，至少大坌坑文化是大多數臺灣南島系民族的祖先。（註一）

臺灣土著民族屬於南島語族（此一大語族遍佈現今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但在島嶼臺灣之外散佈著許多海溝，以冰河時代獵人的簡單技術顯然無法橫渡，即唯有具備修造航海獨木舟技術，並且能藉觀察星象位置與海潮方向操駕獨木舟的人才能抵達。南島民族擁有這些技術，於西元前四千年從亞洲東南部遷移至島嶼臺灣。此後臺灣並成為南島民族往周圍菲律賓、爪哇等地擴散的中心。（圖 2-1、圖 2-2）

雖然目前考古學者尚未在臺灣中部發現大坌坑文化的遺址，並不表示當地不存在大坌坑文化類型的遺址。而且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營初級的農業生活以來，經過兩千年的腳步，史前時代的人群逐漸長久定居，並擴張生活領域到內陸平原與丘陵邊緣，生活型態也因資源增加和引進新作物而有所改變。以今臺中縣清水鎮的牛罵頭遺址命名的牛罵頭文化，是目前中部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代表；遺址大多分佈於臺中盆地周緣的河岸河階、低位河階與盆地邊緣地勢較高的地區。本鄉麻頭路的遺址即其中主要遺址之一。

牛罵頭文化大約在距今三千七百至三千五百年的階段，逐漸轉變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前文化，並與營埔文化的早期銜接。而下一階段的營埔文化極可能由牛罵頭文化演變而來；這個階段人類的生活型態已經以農業為主體，狩獵與漁業亦相當發達。本鄉大甲東的遺址為營埔文化之營埔類型（年代為三、二〇〇—二一、

註一：這群移民而來的新文化，以臺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遺址下層為代表，稱為大坌坑文化，其年代距今七千至五千年之間，或可延續到四千七百年前。由於其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間並無直接發展關係；另一方面在臺灣又找不到大坌坑文化的祖型文化，因此，一般學者認為這群人由海外移民而來，Peter Bellwood更將大坌坑文化視為南島族群的起源文化，並繪出南島民族遷徙過程的時空分佈圖。參閱劉益昌，《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八年）；（圖 2-1）澳洲國立大學 Peter Bellwood,"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Scientific American*（July 1991）,pp.88-93。

先住民篇.tpf-2 7/9/2004 11:1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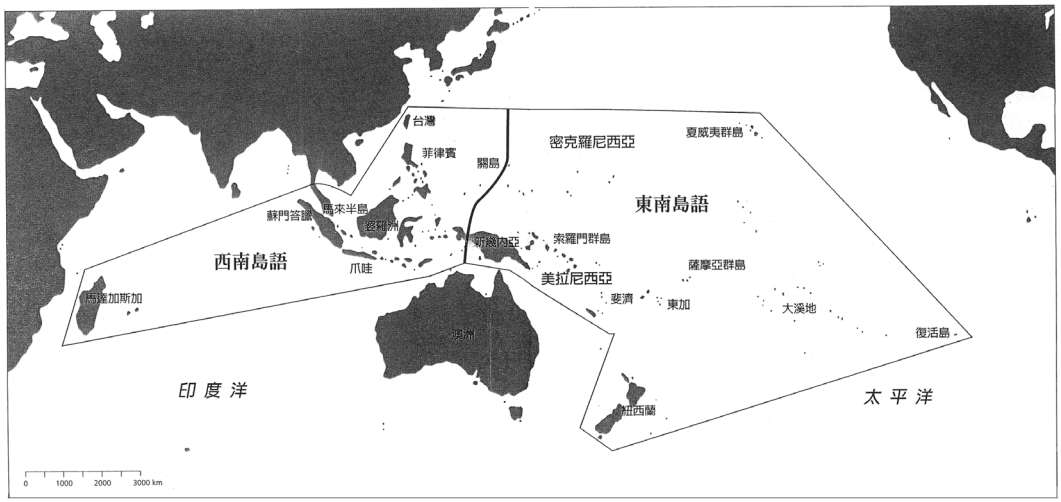


圖 2-1　南島語分佈圖

資料來源：*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2)，第二十二冊，頁 755（重繪），引自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三版二刷），頁 3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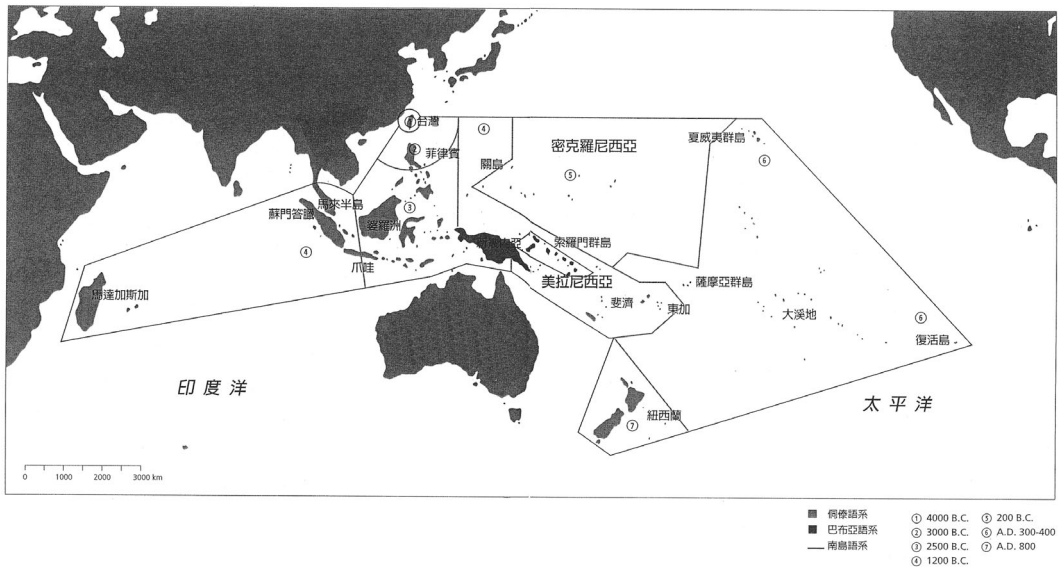


圖 2-2　南島語擴散階段圖

資料來源：同前圖，頁 40-41；Peter Bellwood（1991 重繪）。

先住民篇.tpf-3 7/9/2004 11:14:41

八〇〇）的主要遺址之一。

臺灣地區最晚的史前階段為金屬器時代（或稱鐵器時代）。距今二千至四百年前分佈於海岸地區的番仔園文化，主要分佈在大肚臺地的西側，北及苗栗縣南部的海岸丘陵，南至八卦臺地。本鄉麻頭路的遺址即其中主要遺址之一。新石器時代晚期屬於番仔園文化的人類已分散在許多不同的生態環境中，並產生多元化的適應，約十六、十七世紀華南沿海漢人逐漸移入後，中部地區進入歷史時期。（註二）換言之，番仔園文化類型的主人顯然是歷史初期中部臺灣多族群文化的源頭。

簡言之，臺灣西海岸史前文化的系統、層次及年代，可分作三個文化區，即北部（臺北盆地）、中部（大甲臺地與大肚丘陵）與南部（西南海岸）。（註三）其中中部地區遺址又可分為繩紋陶文化、第一黑陶文化及第二黑陶文化等三群。（註四）其史前文化生活面貌，有以下幾點特色：（註五）

(1)粗繩紋陶器為濁大（指濁水、大肚兩溪流域）最大的陶器，是以淺或深橘色的陶器為代表，與北部大坌坑式繩紋陶類似，絕對年代未知。當時人類已經營漁業及農業的生涯。

(2)細繩紋陶文化層的絕對年代為二千五百至二千，以深橘紅色的陶器為代表，以罐形器為主，口部時有一道脊狀突起物為特色。當時已有農、漁生活方式存在。

(3)紅色素面陶與灰黑色陶文化層，大致始於公元二千年以後，相當於大甲臺地第一黑陶文化，但加上來自紅陶的影響。紅色素面陶文化層以紅褐色或灰黃褐陶器為代表，質細，有含砂及泥質者。由器物內容及其分佈範圍已抵達臺中盆地南緣推判，可能有人口增加趨勢。其生活方式為農漁，且可能有狩獵。灰黑色陶文化層以灰或黑色硬陶為代表，質細且硬，由圓圈及羽狀紋飾、板岩製的長方形及半月形石刀推斷，當時已有種植稻米及小米等作物。代表性遺址有北庄村、牛罵頭上層等。當時先民已操漁、農，乃至有木工建造生活。

(4)黑色壓印紋陶文化以黑色陶器為代表，即過去的大甲臺地第二黑陶文化，早到紀元初期的數百年。陶器質地有細砂及泥質二種，此文化層與貝塚具密切關係。當時人類營採貝、沿海打漁、狩獵生涯，有殉葬的習俗。

如上所述，本鄉土著族的祖先應與麻頭路、大甲東等遺址的主人有關；其生活風貌，正如以上所指由牛罵頭文化類型進入番仔園文化類型一般，營農業的生活，狩獵與漁業亦相當發達。本

註二：黃增泉、臧振華，〈臺灣之古生態研究（六）臺灣中部十八張、大邱園、牛罵頭、草鞋墩等史前遺址的孢粉分析〉，《臺大考古人類學刊》39、40期（民國六十一年），頁107。

註三：張光直，〈圓山發掘對臺灣史前研究之貢獻〉，《大陸雜誌》9卷2期（民國四十三年），頁36-41。

註四：宋文薰、張光直，〈臺中縣水尾溪畔史前遺址試掘報告〉，《臺大考古人類學刊》3期（民國四十三年），頁38、49-50。該文進一步指出：臺灣中部地方最古老的文化層為繩紋陶所代表的文化，晚期繩紋似已逐漸減少，而為素面紅陶所取代。繩紋紅陶文化層之上為黑色陶器文化層（即大甲臺地第一黑陶文化層），最上層為貝塚文化（即所謂大甲臺地第二黑陶文化），可能已屬於初期鐵器時代。在第二黑陶文化時期的末期，由於以「平安壺」為代表的初期漢文化傳入，而進入歷史時代。

註五：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六十六年），頁409-436；何傳坤，〈臺中縣大肚山臺地及彰化、南投縣境八卦山臺地史前文化調查報告〉，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頁59-61。

先住民篇.tpf-4 7/9/2004 11:14:41

鄉土著與其祖先皆為無文字記錄的民族，十七世紀當臺灣成為西方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史之一舞臺後，西班牙、荷蘭先後成為島嶼臺灣的統治者，有關本鄉土著族的相關記錄始陸續出現。尤其清代以來，漢人與土著接觸頻繁，相關文獻的記載較前具體。

第二節 土著部落

壹、土著與南島民族之關係

大安、大甲溪下游所流經的地區地處島嶼臺灣中部地帶，南北兩方分別與彰化八卦臺地及苗栗臺地為鄰，在空間上形成一個自然地理區，即地理學者所稱的大甲溪沿海平原（包括大肚臺地西側、大甲扇形平原、清水隆起海岸平原），與北臺中盆地及周緣（包括東勢丘陵、新社河階群、臺中盆地、后里臺地、豐原山地、大肚臺地東側）等地形區。前者區域內地形低平，僅有大肚臺地及鐵砧山較為突出；後者的地勢亦相當低平，盆地面由北向南傾斜，受車籠埔斷層（銅鑼斷層）影響：西側山地較為陡峭，但也有相當多沖蝕溝口所形成的小型沖積扇，后里、外埔地區雖部份與大甲地區相鄰，但較內側地帶則與平原地區相近。（圖2-3）每一地形區分佈不同的族社。

歷史上曾在大安、大甲溪下游地區駐足的族群，以日治時期語言學與民族學的分類標準來說，大甲沿海平原（包括今大安鄉、大甲鎮、清水鎮、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大肚鄉的一部份，及外埔鄉的一部份）原住的族群包括沿海的道卡斯（Tokas）、拍瀑拉（Papura）兩大族群，十八世紀（雍正九年，一九三一）大甲西社聯合中部平埔族抗清事件前，主導中部土著社會活動。臺中盆地及周緣地區（行政區域涵蓋今臺中市的大部分、烏日鄉、大肚鄉、霧峰鄉、太平市、大雅鄉、神岡鄉、潭子鄉、豐原市、后里鄉、外埔鄉一部份，以及新社鄉、石岡鄉、東勢鎮的一部份）的族群有巴宰（Pazeh）、巴布薩（Babuza）與洪雅（Hoanya），大甲西社事件爆發後，巴宰崛起為中部地區最大族社。在其興起前，臺中盆地北半部的主要活動者為巴布薩族貓霧揀社。以上總計道卡斯、巴宰、拍瀑拉、貓霧揀、洪雅等五族、約三十個部落。（註六）

此外，與盆地族群關係較密切者尚有東緣淺山、深山地區的高山族，如分佈於今大安溪上游（今臺中縣和平鄉，屬泰雅族北勢群）與大甲溪上游（今臺中縣和平鄉和平村，屬泰雅族賽考列克系統族群）之泰雅族（Ataya）。（註七；圖2-4）

本鄉境位處大甲扇形平原東側、后里臺地之西，曾為道卡斯族大甲東社的活動地，以及鐵砧山附近一小部份地方為大甲西社社域範圍。

臺灣史研究者通常稱土著為先住民或原住民，在日治時期、

註六：關於拍瀑拉與巴宰族的勢力變遷，參閱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一七〇〇～一八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七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卷4期（民國八十一年），頁183-175；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的相關論述。

註七：關於泰雅族與巴宰族的關係，請參閱程式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1766~1786）〉（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清代臺中沿山地區族群關係初探—巴宰族群與泰雅族〉（中臺灣鄉土文化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至十五日），頁1-26。

先住民篇.tpf-5 7/9/2004 11:1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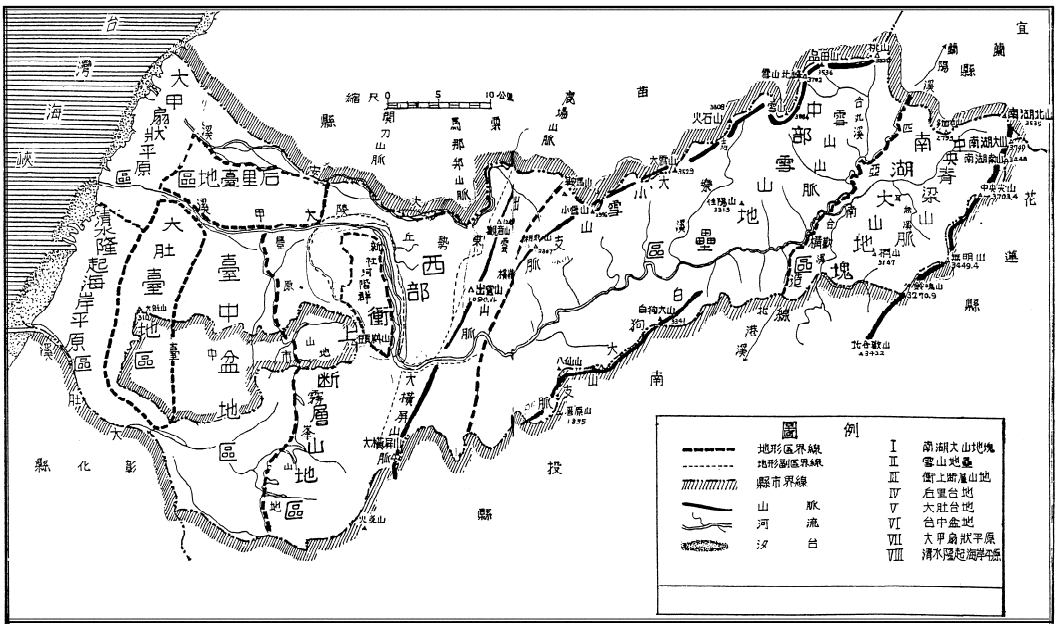


圖 2-3　大安、大甲溪流域地理區

資料來源：張勝彥總纂，《台中縣志》，卷一土地志（豐原：台中縣政府，民國七十八年），頁 6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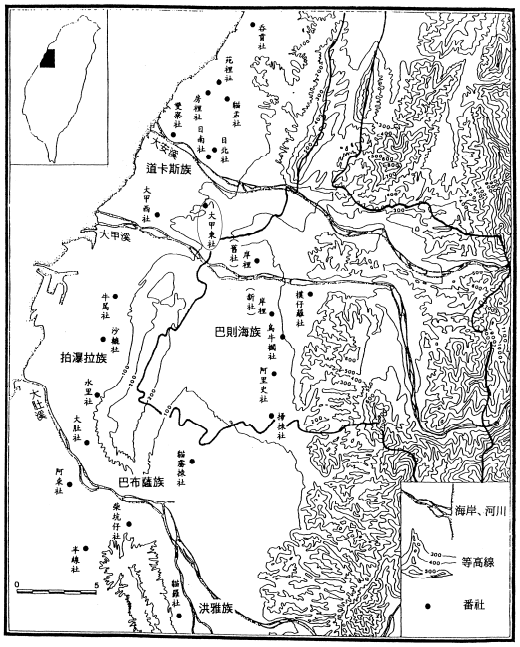


圖 2-4　大安、大甲溪下游地區平埔部落分佈圖

資料來源：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八十四年），頁 47。

先住民篇.tpf-6 7/9/2004 11:14:41

戰後以來的學術分類，土著、先住民或原住民則涵括平埔諸族（即清代文獻的「熟番」）與高山各族（即清代文獻的「生番」）；兩者又統稱為南島民族。所謂南島民族分佈的範圍極廣，東起太平洋上的復活島，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南到紐西蘭、新幾內亞，最北的極限則為臺灣。（註八；圖2-2）

在十七世紀外來族群抵達臺灣之前，無論平原、盆地，或淺山、深山地區，皆為南島民族的分佈地。其中平埔族的活動範圍北起宜蘭平原，經臺北盆地、西部海岸平原，抵屏東平原一帶；高山族則大致散居在中央山脈一線及其以東的地區。由於地緣上濱海的關係，以往臺灣和亞洲太平洋各地區的往來，以住在平原上的平埔族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當臺灣成為西方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史之一舞臺後，幾世紀間平埔族也成為首當其衝面臨外來文化的衝擊。而十九世紀末清廷實施「開山撫番」以前，一直被隔離於「番界」之外的高山族群，則承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較小，直至日人殖民統治後，始成為理「番」政策執行的主要對象。

「平埔」一詞最早見於黃叔璥完成於清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的作品《臺海使槎錄》「耕種犁耙諸器，均如漢人……平埔諸社多仿漢人。」（註九）惟其非族群之稱，相對於高山諸社，主要依地理位置而分，即「後山為生番巢穴，名曰高山番；山外皆熟番所居，名曰平埔番。」（註十）而前後山之別，又與官方教化是否到達、漢人拓墾活動情況，息息相關。茲列清代黃淑璥、陳夢林等官員的說法，以為參考：

>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註十一）
>
> 山高海大，番人稟生其間，無姓而有字。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註十二）
>
> 臺灣四面皆海，而大山亙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居，山以東有番無民，……於東西之間，分疆畫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或未歸化，皆生番也。（註十三）

足見平埔族並非族群的名稱。

日治時期源於對清代「生、熟番」的二分法，在學術分類上之平埔族即清代文獻所據稱的「熟番」，也稱「土番」，是清代漢「番」關係的主要對象；高砂族（戰後改稱高山族）即指「生番」，或稱「野番」、「山番」。清代的生熟之別，主要以土著歸化清廷與否為劃分標準，介於生熟之間者為「化番」。一般學者將平埔族分成八族，也有分成九族或十族者；高山九族則是較為共同認定的看法。無論緣於政治、文化等漢人化約「異己」的指稱「番」，或始於日治時期行政區劃上「熟番／平埔族」、「生番／高砂族」的種族類稱，均與歷史發展和理「番」政策有關，皆為外來族群所抱持的觀點。（註十四）

如上所述，平埔族或高山族均非族群的名稱，日治時期日本

註八：Peter Bellwood,"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註九：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文叢」，民國四十六年），頁132。

註十：黃逢昶，《臺灣生熟番記事》，〈臺灣驅寇論〉（臺文叢五十一種，民國四十九年），頁1。

註十一：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67。

註十二：陳夢林，《諸羅縣志》（臺文叢一四一種，民國五十一年），頁154-155。

註十三：鄧傳安，《蠡測彙鈔》（臺文叢九種，民國四十七年），頁1。

註十四：關於「生熟番」、平埔與高山詞彙的演變，張隆志在《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書中，有較完整的討論。參閱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八十年），頁49-81。目前法律所認定的原住民（包括高山族與平埔族）共十一族。

先住民篇.tpf-7 7/9/2004 11:14:41

研究者始進行學術分類；所謂平埔族是指風俗習慣深受外來文化（主要為漢文化）影響，語言多已成死語，與尚操固有語言、保留大部份習俗的高山族群不同。

本鄉境大甲東社與大甲西社均為南島民族中平埔族道卡斯之一社群。以下茲以大甲東社為例，說明其原始生活領域、社經生活暨其變遷狀況。

貳、大甲東社之生活領域與村社規模

一、原始生活領域範圍

大甲東社為大甲社分支，位在大甲社本社大甲西社之東，后里臺地巴宰族岸裡社群舊社蚋薯社之西；南以大甲溪與清水平原的拍瀑拉族牛罵社、臺中盆地的岸裡大社相望；北則隔大安溪與道卡斯日南社接境。依據本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五章第一節平埔古文書所示，大甲東社的社域範圍大約包括今臺中縣外埔鄉境，並及大甲鎮與大安鄉西南境，以及與大甲西社共享，分佈在桃園縣龍潭鄉高塘村、中山村的養贍埔地。（註五）

大甲東社舊址在本鄉境大東村，依據屯丁資料，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大甲東社已分支發展，另立大甲中社，（表2-2、2-3）此支社的地理位置應在大甲東西社之間，但中社之名目前並未見於其他資料，無從進一步論述。

依大甲東社契字所示，至遲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大甲東社已遷離舊居，並在今中山村另立新居，漢人稱為「番社」。（註六）據「臺灣堡圖」所示，在大甲東（今臺中縣外埔鄉大東村）、磁碌（今臺中縣外埔鄉大同、三崁等村）、馬鳴埔（今臺中縣外埔鄉馬鳴村）之間，月眉製糖鐵路南側有一聚落，即「番社」（臺中縣外埔鄉中山村）所在。

「番社」外，在原屬大甲東社生活領域內，尚有「番仔井」（在大甲東庄後湖，今外埔鄉鐵山村）、（註七）番仔田（在鐵砧山麓一帶，今外埔鄉鐵山村）、「番仔寮」（在今大甲鎮義和里）等地名。「番仔田」位於「番社」西北方，為漢人對平埔社人之田園的稱呼；「番仔井」位在「番仔田」東南，介於「番仔田」與「番社」之間，一如「番婆井」，乃自然出泉處，為漢人對於位在平埔村落的井水之稱；「番仔寮」位於大甲街西南、大甲溪北岸，地緣上近鄰大甲西社領域，但其地為大甲東社所有，應為大甲東社人所形成的居址。一般而言，「番社」為歷史時期平埔族社相對於舊社之新居，多半與漢人移墾、定居，社人出賣或杜賣社地、生活空間縮小有關。

清代的平埔村落和漢人村庄原有所區分，《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載：

> 凡稱番社者，皆番所居；至於里、保、莊皆漢人所居。（註八）

《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載：

>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闤闠囂塵，居處叢雜，人煙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衕衖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註九）

註五：參閱本文表2-1及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之研究與導讀》（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九十一年），表5。

註六：參閱本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古文書，編號2、4。

註七：參閱本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古文書，編號22、39。

註八：陳夢林，《諸羅縣志》，頁6、29。

註九：周璽，《彰化縣志》（臺文叢一五六種，民國五十一年），頁39。

先住民篇.tpf-8 7/9/2004 11:14:41

表 2-1 道卡斯族大甲東社之社域範圍

社名	原始地理範圍	
	土名	今地名
大甲東社	大甲東社前、本社前西畔	台中縣外埔鄉大東村
	媽明埔東畔、媽明埔東勢、馬鳴埔庄北勢、過坑仔、馬鳴埔庄東勢車路北、頂竹圍過坑仔、馬鳴埔庄東勢過坑仔、馬鳴埔庄花紅第一段、大甲東後湖埤腳庄北勢	台中縣外埔鄉馬鳴村
	番社前西畔	台中縣外埔鄉中山村
	磁磕庄前二崁頂、磁磕庄下崁	台中縣外埔鄉大同、三崁等村
	三占仔、井仔頭	台中縣外埔鄉鐵山村
	瓦磕頂、瓦磕後、馬鳴埔瓦瑤後	台中縣外埔鄉馬鳴村
	長崎頭	似台中縣外埔鄉馬鳴村
	后湖崩仔、大甲東庄後湖中埔仔前、大甲東庄後湖番仔井（口）、大甲東庄後湖第一段、大甲東庄後湖鐵砧山腳、大甲東後湖頭貳島	台中縣外埔鄉鐵山村、中山村
	山腳	台中縣大甲鎮岷山、中山、南陽、薰風等里
	四張犁東畔、舊庄、庄尾	台中縣大甲鎮頂店、平安、庄美、新美等村
	牛埔仔庄東南畔	台中縣大安鄉福興村

資料來源：依據洪麗完，《外埔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古文書製成。

足見「社」指平埔村落；漢人村落則稱「庄」。清代官方治理「番社」，一直採取將其與漢人隔離的政策；（註二十）然而隨著漢人移民日多，漢庄逐漸與土著部落形成錯居局面。就漢人而言，早期拓荒生活隨著開墾活動的成果逐漸穩定、人數日多，社經勢力漸漸超越土著後，漢文化的優越意識漸顯，並視土著為未受「文明」洗禮的化外之民；因此，稱土著族群為「番」，土著居址為「番社」。由「番社」、「番仔田」、「番仔寮」、「番仔井」等地名的出現，足以說明族群勢力變遷的事實。另方面，從十九世紀初、中葉，社人曾參與移住宜蘭平原與埔里盆地之舉，也可說明彼消我長的狀況。（參閱本文討論）

目前本鄉境土地多為鄉民所有，鄉民又以閩粵漢人，尤其閩人居多數。（參閱本鄉志第四篇住民、第柒篇經濟）大甲東社之後裔則分居各村里境內，但似以大東村與馬鳴村為主要聚居地。

二、村社規模

歷史初期，生活於後龍溪與大甲溪之間海岸平原區的土著族群，在清代文獻上指為崩山八社。依其地理位置，由北而南，包括吞霄、宛裡、猫盂、房裏、雙寮、南日、大甲西、大甲東等社。

依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成書《諸羅縣志》「山川總圖」所示，大甲東社位在大甲溪北岸，介於崩山與鐵砧山之間；東社之西為西社居址（介於大甲溪與大安溪間）；往北大安溪與房裡溪間分別為靠海的雙寮社與東依南日山的房裡社所在。至於南日山北有猫盂山、宛里山，兩山之西為宛里社址；宛里社西南為南

註二十：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灣研究叢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三版），頁3-116。

先住民篇.tpf-9 7/9/2004 11:14:41

日社，與房裡社（事實上該社靠海）隔房裡溪相望；宛里社西北為吞霄社。而位在吞霄社之南、南日社西北與宛里社西南者為猫盂社（隔房裡溪與雙寮相望）。（註三）至於崩山社域：「崩山八社所屬地，橫亙二百餘里。高阜居多，低下處少。」（註三）即位在後龍溪與大甲溪之間的苗栗丘陵區、大甲平原；兩地理區（由北而南）分別為房里、大安兩溪切割。

依據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高拱乾《臺灣府志》指「崩山社（離府治八百七十里）」；（註三）該書對各社群的「舊額」餉銀記為「崩山社徵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六釐八分」，（註三四）所謂舊額指明鄭時代政府的徵銀，足見清領之前崩山社名已見於官方記錄，且為官方徵餉的單位。

最早有關崩山社群的戶政資料，首推十七世紀荷蘭統治時期的戶口表，一六五〇年（明永曆四年）的崩山社群人口記錄，（註三五）包括吞霄社一一五人／三〇戶、房裡社一八九人／四十六戶、南日社三九四人／九〇戶、大甲社四〇一人／一〇五戶等；一六五五年（明永曆八年）再增加雙寮社一〇七人／三十四戶的資料。（註三六）以上足見十七世紀五〇年代中期，崩山社群的村社至少包括吞霄社、房裡社、南日社、大甲社、雙寮社；個別村社規模約百人至四百人不等，每戶平均約三至四人。（表 2-2）到九〇年代，崩山社群又增加茅于（猫盂）、宛里（苑裡）兩社。《臺灣府志》載：

> 大甲溪出猫霧、龜崙二山之間，西過牛罵社轉而西南，至大甲社；又西南至於崩山之房裏、茅于、宛里、吞韶四小社，西入於海。（註三七）
>
> 北面猫霧山（在斗六門東北猫霧揀社界。內與小龜崙山隔大甲溪一條）、小龜崙山（在猫霧揀山北龜崙社界。此山出灘流入淡水港）、南日山（在崩山社界小龜崙山西。中港在此山北發源）、……。（註三八）

九〇年代（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清人郁永河因來臺採硫磺，所完成的遊記《裨海紀遊》亦載：

> 渡凡三溪（指大甲、大安、房裡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至苑裡社宿。自渡溪後，御車番人貌益陋，變胸背雕青為豹文。無論男女，悉剪髮覆額，做頭陀狀，規樹皮為冠，……自此以北，大概略同。……過吞霄社、新港社、至後壠社。（註三九）

據此，有以下兩點結論：(1)崩山指大甲社而言，(2)由大甲至房裡等溪一帶的社群，其生活慣習大概略同。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

註三：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2-13。

註三：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34。

註三：高拱乾，《臺灣府志》（臺文叢六十五種，民國四十九年），頁 38。

註三四：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35。

註三五：有關崩山社群的戶籍資料，最早出現於一六四七年，但一六五〇年為荷蘭在臺統治的盛世，理論上戶籍資料應較完整，故以此年的統計數字為討論基準。

註三六：理論上，統治力量所及之處，始能進行戶口調查工作，十七世紀五〇年代荷人勢力已及崩山社群的領域，惟缺北部苑裡、猫盂兩社資料（但兩社最北邊的吞霄社已在戶口表中），所缺資料可能因中村孝志未比對出該社名，兩社應已存在。參閱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 卷 1 期（民國八十三年），頁 210-209。

註三七：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4。

註三八：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6。

註三九：郁永河，《裨海紀遊》（臺文叢四十四種，民國四十八年），頁 20-21。

先住民篇.tpf-10 7/9/2004 11:14:41

表 2-2 崩山八社戶口表

村社名		人名		年代					
				1650 年 (明永曆四年)	1655 年 (明永曆八年)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同治十年 (1871)	光緒十九年 (1893)	明治四十二年 (1910)
吞霄社 (Parrewan)		總數		115(30)	100(28)				93(22)
		丁口						180+	
		屯丁				25	25	25	
苑裡(苑裏)		總數							
		丁口						180+	
		屯丁				12	12	12	
猫盂		總數							86(12)
		丁口						80+	
		屯丁				8	8	8	
房裡社 (Warrewarre)		總數		189(46)	155(39)				
		丁口						180+	
		屯丁				44	44	44	
雙寮社 (Tennatana-ngh)	總數	雙寮社	總數		107(34)				40(11)
			丁口					170+	
			屯丁			42	42	42	
	丁口	雙寮東勢社	總數						5(3)
			丁口					100+	
			屯丁			44	44	44	
南日社 (Warro-uwar)	總數	日南社	總數	394(90)	166(44)				5(2)
			丁口					100+	
			屯丁			74	74	74	
	丁口	日北社	總數						
			丁口					150+	
			屯丁			70	70	70	
大甲社 (Tumel)	總數	大甲西社	總數	401(105)	42(106)				21(8)
			丁口					100+	
			屯丁			40	40	40	
	丁口	大甲東社	總數						50(15)
			丁口					150+	
			屯丁			40	72	40	
		大甲中社	總數						
			丁口						
			屯丁			32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蘭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台灣風物》44 卷 1 期（民國八十三年），頁 210；依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下冊（東京：刀江書店，昭和四十年）頁 736-737；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台北：古亭書屋，明治三十七年），頁 379；陳培桂，《淡水廳志》（台文叢一七二種，民國五十二年），頁 83-84；沈茂陰，《苗栗縣志》（台文叢一五九種，民國五十一年），頁 49-50；《平埔番調查書》（明治四十三年）。

說　　明：⑴括號中的數字表示戶數。⑵陳培桂，《淡水廳志》將同治九年大甲東西、日南北、雙寮等五社的番丁數合計於德化社轄下，其總數為二三七丁；房裏、猫盂、吞霄、苑裏等四社的番丁總合計為一一三丁，與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台文叢一二一種，民國四十八年，頁 263）指「蓬山社併附大甲東、宛裏、南日、猫盂、德化庄、房裏、雙寮、吞霄等社番丁共三百五十。」的記錄相同，蓋丁為官方徵餉的單位（以上數字皆非人口總數），因此，由乾隆年間至同治年間皆維持不變。⑶沈茂陰，《苗栗縣志》；陳培桂，《淡水廳志》的屯丁數與乾隆五十一年的數額一樣。⑷日治初期的統計資料，主要來自《平埔蕃調查書》（又名《熟蕃戶口及沿革調查綴》），為各地方廳官吏對其轄管區內之平埔族族名、莊名、戶數、男女人口、遷徙口傳資料，以及日治時期之概略的調查記錄。本資料可說是日治之初較具全面性與完整性的記錄，為研究平埔族相當重要的資料，惟有待考証之處頗多，對本書統計資料的正確性，筆者持疑。此處所列，僅供參考。

先住民篇.tpf-11 7/9/2004 11:14:41

二）由巡臺御史黃叔璥根據訪查所得而完成的《臺海使槎錄》一書，更進一步將臺灣土著分成北路十區、南路三區，可見黃氏已初步了解土著族群間的差異，並大致區分出社群間的關係。

依據黃著，分佈於大甲溪與新竹鳳山溪之間的「北路諸羅番九」，包括崩山社群（八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裡、南日、貓盂、房裏、雙寮、吞霄社）、後壠社群（五社：後龍、新港仔、貓裏、加至閣、中港仔）、竹塹社群（竹塹、礁磅巴）。（註三）即後來日本學者所界定的「Taokas（道卡斯族）」；主要基於他們自稱為「taukas」的理由，（註三）此後道卡斯的族名乃正式被認定、使用。換言之，清代舊志、時人或已觀察到以上諸社群間的關係，並依生活慣習的類似而劃各社群為同一類屬，但並無「族群」的名稱。今日學界或民間的族群概念乃傳承自日本研究者。

據黃氏所指，「崩山八社」名至遲康熙末年已出現，其中大甲社（崩山）並且已分支發展為大甲東社、大甲西社。（註三）換言之，崩山社群包括崩山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裡、南日、貓盂、房裏、雙寮、吞霄社等九社；一般習稱「崩山八社」，可能與後來崩山社的消失有關。（註三）而郁永河《裨海紀遊》指崩山即大甲社，除了意味崩山八社乃以崩山為主的八個社群，崩山八社之得名，應與其活動領域位在崩山附近有關。故當崩山之名改稱蓬山時，亦出現蓬山（八）社之稱。（註三）

依據表2-2所示，荷治時期崩山社群中以南日社與大甲社的村社規模為大。前者至遲於十八世紀六〇年代發展為日南、日北兩支社；後者早在十八世紀二〇年代已發展成崩山、大甲東與大甲西三社，九〇年代又增加大甲中社。（註三）另，雙寮社也在乾

註三：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29。

註三：宮本沿人雖推測最早為平埔人進行分類的伊能嘉矩之定崩山八社、後壠五社、竹塹三大群為道卡斯族，主要基於他們自稱為「taukas」，伊能本人並未解釋稱諸社群為道卡斯族的理由。參閱伊能嘉矩，〈臺灣ニ於ケル「ベイポ」族ノ概察〉，《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期（民國八十八年），頁304；宮本沿人，〈臺灣新竹州の新港熟社番部落〉，《民族學研究》14卷2期（民國三十八年），頁79（見宋文薰譯，〈苗栗新港的平埔部落〉，胡家瑜主編，《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臺北：臺大人類學系，民國八十八年，頁214-217）。

註三：陳夢林完成於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志》，頁31載：「崩山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裏社、房裏社、南日社、雙寮社、貓盂社、吞霄社……以上各社俱在縣北。」

註三：完成於康熙三十六年的《裨海紀遊》、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志》與乾隆二十九年的《續修臺灣府志》，均見崩山社名，但完成於康熙六十一年的《臺海使槎錄》與乾隆六年完成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則僅見崩山八社的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裏社、房裏社、南日社、雙寮社、貓盂社、吞霄社等，崩山社已不再單獨立名，則崩山社的消失可能不晚於康熙六十一年。至於出現在乾隆二十九年《續修臺灣府志》的崩山社則作為納餉的單位，換言之，崩山社雖已消失，其作為官方徵餉單位的有效性仍在。而作為納餉單位的崩山社至遲到同治十年已分為「德化社管大甲東西、日南北、雙寮等五社二百三十七丁……房裏、貓盂、吞霄、苑裏等四社一百一十三丁……。」參閱郁永河，《裨海紀遊》，頁20-21；陳夢林，《諸羅縣志》，頁31；與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29；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圖書有限公司），頁8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文叢一二一種，民國四十八年），頁82；陳培桂，《淡水廳志》（臺文叢一七二種，民國五十二年），頁90。惟由大甲西社契字所示，大甲西社也稱大甲社。前舉郁氏指大甲社即崩山，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7：「渡溪後過大甲社（即蓬山）、雙寮社，至苑裏社……。」究竟大甲西社與崩山社的關係為何，有待更多資料的論證。

註三：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62指：「蓬山：在大肚山北。舊名崩山，今改名」，說明當崩山改名蓬山，崩山八社也改稱蓬山八社的事實。頁82又指「德化社（舊名大甲西社）、大甲東社、南日社、雙寮社、貓盂社、房裏社、苑裡社、吞霄社（以上為蓬山八社）。」

註三：惟大甲中社名目前僅見於乾隆五十六年的屯丁資料，之前、之後均未有所見。參閱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古亭書屋，明治三十七年），頁379。

先住民篇.tpf-12 7/9/2004 11:14:41

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屯制施行前分支發展。

依表2-2的屯丁數資料而言，雙寮（西勢）社之屯丁額為四十二名、雙寮東勢社四十四名，說明本社雙寮社在屯制施行之前，已是頗具規模的村社。由於「屯丁人數，應按各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註三六）由雙寮社與雙寮東勢社的屯丁數額已各別計算，表示兩者已各立村社。若由十八世紀九〇年代崩山社群之吞霄（屯丁二十五名）、苑裡（屯丁十二名）、房裡（屯丁四十四名）等村社規模較小（屯丁數小於四十四名）的社群，均未分支發展的事實，似乎可反證村落規模較大者，有另立新社的需求。簡言之，諸社群的分支發展，多半與人口成長有關。

依據目前的研究成果，遍佈現今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南島語族，約在距今六千年冰河時代結束，海水上漲形成臺灣海峽以後，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抵達、定居島嶼臺灣，崩山社群即為這群人的後裔。崩山社人的祖先已知製造陶器，並經營初級山田燒墾農業；他們的生活方式，包括頻繁的遷居行為、山田燒墾並從事狩獵、漁撈與採集野生植物。（註三七）這種生產方式所能維持的村社規模，一般不大。依黃叔璥的觀察：「社之大者，不過一、兩百丁，社之小者，止有二、三十丁。」足見一般。（註三八）因此，社大人繁之時，必然分支發展、往外擴散，乃臺灣平埔村社發展的過程。

目前關於崩山社群的人口資料，雖無直接的統計數字可資利用，但由《續修臺灣府志》載：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崩山社等社「番丁」共三五〇（註三九）與表2-2乾隆五十五年崩山社群的屯丁總數為四三一，說明十八世紀三〇至九〇年代諸社群人口增長情形。按各社屯丁數額主要依社人總額酌撥，其與總人口的比例如何，固然無從知悉，但九〇年代崩山社群的人口總數必然在屯丁數額倍數以上；若以四倍計算（即一戶四口，一人為屯丁），（註四十）當代人口數應為一、七二四人，與三〇年代比，約增加一、三七四人（每年滋長58.4人）。（註四一）而三〇年代崩山社群中大甲東西、日南北、雙寮等五社的番丁數總數為二三七丁；房裏、猫盂、吞霄、苑裏等四社的番丁總數合計為一一三丁，前者為後者的倍數，村社規模顯然較大，可以闡釋何以前者不得不分支發展，後者仍保留原來的村社規模。（表2-2「說明」）

如上所述，歷史初期，生活於後龍溪與大甲溪之間海岸平原區的土著族群，在清代文獻上即所謂崩山八社。依其地理位置，由北而南，包括吞霄社、苑裡、猫盂、房裏、雙寮、南日、大甲西、大甲東等社。其生活領域，以地理學者的分法，所處地帶為島嶼臺灣四大區域（中部山地、北部丘陵區、西部平原區、東南丘陵區）中北部丘陵區之苗栗丘陵南端、西部平原區之大甲平原北端。（註四二）大致上，除南日社地處苗栗丘陵、大甲平原外、

註三六：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317。
註三七：同註一。
註三八：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63。
註三九：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263。
註四十：依荷治時期的戶口資料，崩山社群每戶的平均人口約四人，參閱本文表2-2。
註四一：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蓬山社等社的番丁（三五一）並非人口總數，而是納餉人口數。
註四二：陳正詳，《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民國八十三年），頁768-895。

先住民篇.tpf-13 7/9/2004 11:14:41

表 2-3　崩山社群發展情形



吞霄社、苑裡、猫盂、房裏四社地處苗栗丘陵區；雙寮、大甲西、大甲東三社在大甲平原。

歷史上的崩山社（即大甲社）又名蓬山社，早在明鄭時期即為納餉的單位，（至遲）十八世紀二〇年代已發展成八社的規模，六〇年代南日社發展為日南、日北兩支社，但崩山社已在二〇年代消失；即崩山八社仍維持八社的規模。惟依據屯丁資料，至遲乾隆五十五年雙寮社已分支發展為雙寮（西）社與雙寮東勢社，同樣地，大甲東社也分出支社大甲中社，（註四三）則十八世紀九〇年代崩山社群已發展成十一社的規模。而崩山社群的分支、析立新社，與人口滋生有關。三〇年代的崩山社群甫由雍正九、十年的抗清事件中復甦，人口之能滋生，可能與漢人賧墾（提供租稅）、漢式耕技（水稻種植）的傳入平埔社會，改善其經濟生活（限某一時期）有關。（註四四）

註四三：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83-84。不過，直到八〇年代其番餉額仍合併計算，參閱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90。

註四四：有關十八世紀中期平埔人的生活狀況，可能比漢人佳的討論，可參閱洪麗完，〈異族接觸與南島民族之「文明化」：十八世紀後半葉岸裡社群社會文化之探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劃成果發表研討會」，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頁 28-34 的討論。

先住民篇.tpf-14 7/9/2004 11:14:41

第八章 大甲東社人之社會經濟型態

第一節 物質生活

壹、生業

大甲東社人的傳統經濟活動尚處維生經濟階段，其經濟生活以狩獵為主，兼有簡單的農業生產，以及捕魚活動。

狩獵為土著主要的經濟活動，遠在十七世紀明末漢人移民入臺之初，漢人即常以米、鹽、雜貨等物品與之交換狩獵之物。狩獵尤以捕鹿為主要，蓋臺灣自然環境即無猛獸，如虎獅的吞噬，而「草之暢茂，且稀霜雪」，極適宜鹿隻的生存，故鹿產特多。《淡水廳志》〈社寮雜詩〉描述土著射鹿情形：

> 春郊漠漠水湯湯，莫問當時射鹿場。牽得駿尨朝出草，先開火路內山旁（外山皆墾成田園。射鹿皆於內山，焚林逐鹿，必先開火路，防燎原也，番謂射鹿為出草）。（註一）

十七世紀中葉荷人治臺，主要目的在以臺灣為其貿易轉接基地，蓋其時島嶼臺灣大部份地方尚處未拓墾的狀態，土著經濟生產力低微，除用其獵場及採取其境域的天然資源外，實無何可利用之處。然而日本需求鹿皮甚殷，臺灣又產鹿隻，荷人乃一方面要求土著部落交納鹿皮以為社餉，一方面透過「賦社制」，由漢人與平埔族進行鹿皮的交易。按其時凡社人之所有與社人之所需，皆經商人之手，故僅社商得以入山捕鹿。所謂「社商」即指准與部落從事貿易的漢人而言。如是則平埔社會由於與外界有所接觸，遂漸產生變化。類此賦社制度在清代仍加以承襲。（註二）雖則荷治時期的賦社制度可能尚未實施於本鄉境，並不表示大甲東社人完全不受因鹿皮生產而逐漸形成之市場經濟的影響；中國移民也可能已在當地活動。（參閱本篇第九章第一節）

平埔族以狩獵為主要經濟活動，農業技術又較簡單，農業生產力低落，對土地的利用相當有限，僅就「居之所近，隨意樹藝，不深耕，不灌溉」，乃至「近水濕田，置之不用」。《淡水廳志》載：

> 生番人稀土曠，地無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隨意樹藝，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餘糧已不勝食，積粟無囤無籮。其所恃以與社丁互市，乃射獵所得之皮革、骨角、毛羽及山中諸藥物，取之而不盡者。（註三）

土著的農業生產是採「水耕火耨，不營而足」的方式，蓋因土著部落土多人少，且生產工具粗糙無法深耕使然。《淡水廳志》頁四三四指：「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註四）至荷人佔領臺灣以後，教導平埔人耕作方法，如施行耕牛飼養政策，土著乃多採用牛隻助耕。

本鄉土著大甲東社人的主食以黍為主（也用於釀酒），且喜

註一：陳培桂，《淡水廳志》，〈番俗近古說〉，頁430。

註二：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49-51。

註三：陳培桂，《淡水廳志》，〈番俗近古說〉，頁379。

註四：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34。

先住民篇.tpf-15 7/9/2004 11:14:41

歡吃醃製物；並血食鳥獸肉類，而以雞與冬瓜接待客人。此外，採集紫菜、通草、水藤等物資，進行交易，以為日用、輸餉。《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記：

> 其飲食也；少播杭稻，多種黍、芝麻。每飯黍。又以黍蒸熱置罌缶中，俟發變，曬乾舂為麴拌之，復藏數日投以水，再蒸其液為酒。以魚蝦為鮭、鹿麅為脯，皆醃之；餘物鮮食。……不藝圃，無蔥韭生菜之屬。雞最繁，客至殺以代蔬。俗尚冬瓜，官長來，抱瓜以獻，佐以粉粢；雞則以犒從者。鳥獸之肉，燔炙帶血而食。麋鹿刺其喉，血至盡，乃剝其皮；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即食之。（註五）

《淡水廳志》又載：

> 其飲食近界內者漸種五穀，具農器，薄種薄收，歲有餘糧；外多薯芋為食，嚼米為酒，以手攫食，不用匕箸。（註六）

平埔族社大部份分佈在西部海岸肥沃地域，因此他們很早便從事稻作耕作，但多屬旱稻。自與漢人接觸以來，大部份社人也開始經營水稻，並以稻米為主要糧食。一般炊煮米飯的方法有二，一種把粳米蒸成飯糰，而以手抓食。另一種先把糯米舂碎，然後蒸成糕餅。而平埔各族多在黍收成後舉行祭祀，足見黍在土著農業而言為較原始的作物。（註七）

除捕鹿、種植外，捕魚也是平埔社會之一重要經濟活動。因其集團性的生活觀念，以上三種經濟活動皆屬部落集體行動。狩獵與漁撈主要由青年男子從事，農業生產則以女人為主。（圖像 2-1、2-2、2-3）



圖像 2-1　耕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註五：沈茂蔭，《苗栗縣志》（臺文叢一五九種，民國五十一年），卷七風俗志番俗，頁 120。

註六：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454。

註七：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 61。

先住民篇.tpf-16 7/9/2004 11:14:41



圖像 2-2　捕鹿（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圖像 2-3　捕魚（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先住民篇.tpf-17 7/9/2004 11:14:41

貳、服飾

整體而言，平埔族群精於紡織刺繡，花紋種類繁多，紋樣優美，其衣著尤以參加儀式時所穿最為精美。惟平時或在田間耕作時，男子大部份皆裸體，或圍一護陰，女子亦僅圍一布裙。大致上，其衣服的形制，「下體圍布二幅『遮陰』，衣布做之『几轆』或鹿皮衣」，即只利用布的幅度簡單縫綴。若依衣服的長度分，則有短形（短至臍）與長形（長至足）之不同，本鄉土著的長衫長及腰部。《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載：

> 其衣飾也：……衣曰「几轆」，長至腰；以布及「達戈紋」為之。下體圍布二幅，曰「遮陰」，間有衣鹿皮者。會飲，土官多用優衣蟒服皂靴、漢人絨帽。番婦衣「几轆」、圍「遮陰」；……每年更新衣，曰「換年」；會眾飲酒。（註八）

一般而言，女衣尚白色；男喜紅色。《淡水廳志》〈番俗近古說〉指：

> 女則衣白。其襦□或紅或綠。……古之襦藏以內，番之襦見於外耳。其女衣尚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紅，……。（註九）

大體上，平埔婦女的布裙無裙摺，垂直而下若圓桶（幅布而圍，以寬帶繫住），稱為桶裙（當男女皆著桶裙時，女性必定於膝下以黑布裹腳，盛裝時則用繡花的裹腿）。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無論男女，皆不穿褲子。但在漢文化影響後，土官在會飲時多用「優衣蟒服皂靴、漢人絨帽」。本鄉平埔男女亦都已穿著中國式的寬大褲子了，傳統的圍布桶裙遂逐漸消失。（註十）

參、住屋

大致上，平埔村落的景象與氣氛極恬靜平和，翠綠修竹是其村落的標識。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臺灣先住民部落可能有三百餘個，其中平埔族各村落間雖然經常發動偷襲戰爭，村落本身似乎沒有什麼設防，只是在其周圍種植刺竹，即使有點防衛作用，也稱不上是嚴密的工事。

平埔族家屋的通相是茅蓋竹牆，房屋的特色為地板皆高出地面，約分為兩種：一建於封土臺基之上（土臺），一搭在木構支架上（干欄）。一般臺基（青綠色）周圍砌石；而土臺前沿突出高架的竹片地板，有一丈之高，故其下可以作為勞作休閒，或儲藏室、豢養禽畜的地方。

本鄉土著「砌石誅茅，以避風雨」，（註十二）主要「先豎木為牆，用草結蓋，稍卑隘，合家一室。娶婦贅婿則別居之」，（註十三）而「至社近漢人街莊者，用營屋高廣雅致，無異漢人。」（註十三）

註八：沈茂陰，《苗栗縣志》，頁 120-121。
註九：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380-381。
註十：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語研究所，民國八十七年），頁 20-21。
註十一：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70。
註十二：沈茂陰，《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頁 120-121。
註十三：同上。

先住民篇.tpf-18 7/9/2004 11:14:41

第二節 社會生活

壹、婚姻關係

《淡水廳志》〈社寮雜詩〉載：（註十四）

> 嘉禮初成笑語闐，車螯鹿脯滿長筵。原知有賺期生女，果是新增打喇連（番重女輕男，以男必出贅，謂之無嫌。以女必招贅，謂之有賺。打喇連，番人謂婿也）。

重女輕男為母系社會特質，本鄉土著亦屬母系社會結構。《淡水廳志》〈風俗考番俗〉記：（註十五）

> 其婚嫁也：淡南嫁娶曰「諳貓麻哈呢」。娶婦先以海蛤數升為聘……。蛤大如拇指，殼有青文，生海邊石壁間，盡日採取不過數升，甚珍之。又嫁娶時，用海蛤一搭記。搭記者，用竹篾編成，大口小腰，高尺餘，可容數斗，又殺牛飲酒，歡會竟日。父母視所娶之婦孝否，或一、二年、三五年分居，無一世同居。一女則贅壻，一男則娶婦。男多者聽人招贅；惟幼男則娶婦終養。女多者聽人聘娶；惟幼女則招贅為嗣。夫婦服，必逾年而後嫁娶，後不和，或因姦則離。夫未娶、婦不敢先嫁。嫁則罰婦及後夫，並婦之父母，各瑪瑙珠一串，或牛一隻以歸。後夫不受罰，則糾集親眾，負弓矢持鏢刀，至後夫之家，拆毀房屋倉困。土官通事不能禁止。私通亦然。強者將其婦及姦夫立殺死。或與麻達通，祇罰婦酒一甕，麻達不問。女與麻達通，亦不問。

足見平埔社會在婚姻上多為男子入贅於女家，隨妻而居；在家系承繼上，由女子繼承家產，傳承家系。男女婚嫁時，以海蛤數升或生鹿肉為聘，結婚日「殺牛飲酒，歡會竟日」。通常新婦與男方父母同居一、二年或三、五年後即分居，而無一世同居者。家中只有一女則贅婿，一男則娶婦。「男多者，聽人招贅；惟幼男則娶婦終養。女多者，聽人聘娶；惟幼女則招贅為嗣。」「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已成婚的婦女並「去二齒，以別處女。」（註十六）夫婦不和或因姦則離。一般而言，婚前男女關係較自由；婚後男女關係頗嚴格。（註十七）

平埔各族中未婚男女對婚姻對象的選擇，極為自由。一般為個別擇偶，未婚少男若鍾情於某少女，則日夜在少女家屋前吹奏口琴以挑之，如少女亦屬意該少男，即約定日後約會，互贈禮物定情。本鄉土著「其婚無媒妁，多贅男。」（註十八）一般在婚禮舉行前，男女兩家互贈禮物，若屬於入贅方式，則男子由其親戚送至女家成婚，由女家宴請親屬及其村人。若屬於出嫁方式，則女子嫁到男家，由男家宴請賓客。

然自漢文化滲入後，其婚姻與家系皆發生變化，而產生許多過渡型。一為漢人的型式，即女子出嫁到夫家，其家系家產的傳承，亦與漢人相同。另一種為固有的母系制度混以漢人風俗而成

註十四：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30。
註十五：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05-306。
註十六：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31。
註十七：陳培桂，《淡水廳志》，〈紀地〉，頁454：「……內山生番延不知幾百里，猶不與華通。其婚無媒妁，多贅男。完配後亦少淫亂。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
註十八：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54。

先住民篇.tpf-19 7/9/2004 11:14:41

的過渡型式，稱為「來腳去」。此種婚姻的女子雖然出嫁到夫家，但女方不收聘金，而其丈夫則須不時往女家助其耕種，女方父母喪亡，女子有繼承家產之權利，也有負擔債務與喪葬費之責。至於女子是否冠以夫家之姓並不固定。（註九）

貳、年齡層級組織

一般而言，具有母系社會特質的平埔親族組織，當以女性佔較重要的地位；然在部落組織中，男子又較佔優勢。大部份平埔族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但村社中仍有一定的秩序，年齡是其重要樞紐。諸如男子結婚、女子生育、夫婦同居、遷居廬舍等都有嚴格的限制，可見年齡層級的意義應與其社會禮俗有關，從而發揮維持社會秩序與運作的功能。

平埔各族普遍存在年齡層級組織，年齡最高者即為領袖。即使自其歸化清政府以來，番社組織逐步官僚化，一般土官或頭目，甚至後來改由社人出任的通事，也由最高級的部落領袖中選任。

關於本鄉土著的年齡層級組織情形並無相關記錄，但由中部臺中盆地巴宰族的年齡層級分五級、南部的西拉雅族（Siraya）的七級略可參考。前者分：(1)出生至十三歲的兒童，(2)十四至二十歲的少年，(3)二十一至三十歲的成丁，(4)三十一至四十歲的半長老，以及(5)四十一歲以上的長老。南部的西拉雅族之年齡層級則為：(1)出生至三歲的哺乳期，(2)四歲至結婚，住在公廨，(3)十六、七歲以前，男子垂髮至耳，即留頭陀型的短髮，(4)十八至二十四歲，男子遊手好閒（應是分工不同），(5)三十六、七歲，女子才可生育，(6)三十六、七至五十歲，夫婦始同居，(7)五十至六十歲，夫婦住在田中小屋，兩個月難得進村社一次，（註十）本鄉土著或有類似狀況，目前尚無法釐清。

平埔社會有一個年齡層的人，稱「麻達」（Mada：麻答、貓達、貓踏），指未婚之男性青少年（未婚女子稱「貓女」），箍腹是訓練其奔跑的手段，直到結婚（二十歲）才解除此一約束。《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

> 其善走者曰「雄麻達」；編五色篾束腹至胸，以便奔馳。穿耳每實以竹圈，圈漸舒則耳漸大，垂至肩，乃實以木板或嵌以螺錢；娶婦則去其束箍、摘其耳實。（註三）

束腰不只為了使身手矯健，也是討好女子的方法。換言之，箍肚、捷走、得婦三者存在因果關係。至於開始箍腹的年紀，大約十三、四歲，即進入青春期之時，當外力進來統治之後，許多徭役皆落在其身上，足見年齡層級在平埔社會中，直到十八世紀仍有其現實意義，至少相對於已婚者，麻達享有特權（如未婚者私通，一般是不禁止）。（註三）

註九：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64-65。

註十：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65-66；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頁24-25。

註三：沈茂陰，《苗栗縣志》，頁120-121。

註三：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頁25-26。

先住民篇.tpf-20 7/9/2004 11:14:41

第三節 宗教生活

壹、信仰

本鄉土著所信仰的超自然能力，可分三類：神祈、靈魂、精靈。天神（創造神）為平埔族虔敬的對象，是各神之總體，一切祈禱皆歸之於天神。另有一屬於女性之神，乃與生育有關者。

平埔族相信靈魂不滅，大部份平埔族以為靈魂可分善與惡二種。善靈即祖靈，為一切祭祀的對象；惡靈為死於非命者，或被擊殺之敵人所變成，常在世間作祟，一切疾病均因此而來。精靈存在虛無飄渺間，常常出現於人跡少至之處，或附於大樹、岩石之間。（註三）

土著自與漢人接觸以來，也信仰媽祖、觀音、土地公等民間俗信。（註四）本鄉位在中山村的福德正神即為同治年間大甲東社人所建立的土地廟。（圖像 2-4、2-5、10-29、10-30；參閱本鄉志第十篇宗教禮俗）此外，也拜石頭公，其或為傳統精靈附於大樹、岩石之間信仰的轉化，有待驗證。（圖像 2-6）

貳、祭祀

平埔各族中每年所舉行祭祀的次數不一，或一、二次，或二、三次不等，但其祭祀對象幾乎全部為祖靈，除與其祖先崇拜的觀念特別強烈有關外，也因其他祭儀已漸被遺忘而混於祭祖儀式中。因此，所有的祭祀均稱為「祭祖」。《淡水廳志》的祭祀歌，記：

遲晚目居留什（虔請祖公），遲晚眉（虔請祖母），街乃密乃濃（爾來請爾酒），街乃密乃司買單悶（爾來請爾飯共菜）。打梢打梢樸梢薩魯塞嗼（庇祐年年好禾稼），樸迦薩嚕朱馬嗜嚼（自東自西好收成）。麻查吱斯麻老麻薩拉（捕鹿亦速擒獲）。（註二五）

本鄉土著「每年以黍熟時為節，先期定日，令麻達於高處傳呼，約期會飲；男女著新衣，連手踏地，歌呼鳴鳴。」（註二六）

參、生命禮俗

一、生產

土著習俗喜好沐浴，即使生產亦如此。《淡水廳志》〈社寮雜詩〉記：

繡褓文衣製未便，生兒隨母浴清泉。十年新學唐人俗，五色絲穿長命（土番生子必隨產浴於水，可謂去災）。（註二七）

在受漢文化影響後，更以為具有「觀世音投藥水中，浴之則愈」的效果。（註二八）

註三：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66。

註四：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440。

註五：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淡水各社祭祀歌〉，頁311。

註六：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六考，頁104。另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5：「數十人連手，頓足歌唱為舞。每年更新衣，曰『換年』；會眾飲酒。」

註七：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30-431。

註八：陳培桂，《淡水廳志》，〈社寮雜詩〉，頁431：「出浴前溪笑解襟，落潮水淺上潮深。臨梳洗得沉疴去，大藥曾投觀世音（番人喜浴，雖產亦然。謂觀世音投藥水中，浴之則愈）。」

先住民篇.tpf-21 7/9/2004 11:14:41



圖像 2-4　番社土地公廟（位於中山村番社尾；洪麗完攝於民國 88 年 10 月 16 日）



圖像 2-5　土地公信仰與農業發展有關（位於中山村水田中，由大甲東社人所建的土地公廟，顯示其農業發展狀況；洪麗完攝於民國 88 年 10 月 16 日）

先住民篇.tpf-22 7/9/2004 11:14:41



圖像 2-6 石頭公信仰（由中山村孫姓居民所供奉的石頭公置於其正廳神桌上〔中間蠟燭之後〕；洪麗完攝於民國 88 年 10 月 17 日）

二、拔牙、染齒、拔鬚

平埔各族均有拔牙、染齒與拔鬚的習慣。男女喜折去二上門齒，作為結婚時夫婦定情之禮品。本鄉土著「去二齒，以別處女。」成年平埔族男子有拔鬚習慣，因此不見長髭鬚。

三、埋葬

平埔各族的埋葬，大部份為室內葬，即埋葬在死者家中地下。通常以鹿皮蓆子或棺木、陶罐，包裹屍體；也有石棺葬的風俗。本鄉土著除了「喪無棺槨，埋其屍於臥榻下，覆以土石。」外，（註二六）多讓死人裸體，用鹿皮包裹，扛至山上，再用鹿皮當席子，以平生所穿衣服覆蓋死者，並用土掩埋。《淡水廳志》卷十一風俗考番俗，載：

> 其喪祭也：淡南番死，男女老幼皆裸體，用鹿皮包裹；親屬四人至山上，用鹿皮展鋪如席，以平生衣服覆之，用土掩埋，服尚白。既葬，家人及舁葬者三日不出戶，不舂不歌，所親供給飲食。一月後赴園耕種。通社亦三日不赴園，以社有不吉事也。凡居喪，父母兄弟半月，夫婦一月。一月後婦不帶耳珠，著敝服，他適方如常。淡水番亡，用杉為棺，瘞於屋邊，以常時雜物懸墓前。三日外合家澡身除服，又與別社期年三月十日者不同。（註二七）

凡家有事，家人及送葬者三日不出戶、不備飯食（由親人供給）、不可歌唱；一月後才赴園耕種，同社人也三日不赴園（以社有不吉之事）。有守喪習慣（父母兄弟半月、夫婦一月）；其中與漢

註二六：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六附錄三志餘〈紀地〉，頁 454。

註二七：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306。

先住民篇.tpf-23 7/9/2004 11:14:41

人雜處、受漢俗影響者，辦理父母喪事，一如漢人，並有能守喪三年者。《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記：（註三）

> 若番與居民雜處者，其治父母喪，衣服、衾、棺木均如漢人；間有能終三年之喪者。

此外，本鄉土著本無墓碑的製造風習，因受漢人習俗影響，從以往刻石為記，改為以墓碑為紀念的型式；從而亦有崇拜神主牌位的風俗。（註三；圖像 2-6）

第四節　裝飾藝術

壹、文身與貫耳

大多數平埔族不黥面，但文其身。本鄉土著亦如此。《淡水廳志》記：

> 渡溪後過大甲社（即蓬山）、雙寮社，至苑裏社，御車番人貌甚陋，胸皆雕青為豹文。（註三）

一般文身圖案包括猛禽走獸、魚蟲花草、人形等，而土著男子文身多由祖父命之，宰殺犧牲之後，聚眾飲酒至醉，始施行文身。至於部分由自己決定者，往往其子孫也會相繼沿襲，以示對祖先的尊重。（註三）

平埔男子的另一身體特徵，為「男子競尚大耳」；因貫耳造成耳垂異常發育。流行大耳垂的觀念，與平埔女子最喜歡男子耳垂至肩有關。《淡水廳志》〈社寮雜詩〉記：

> 珥瑞漸貫耳輪寬，肩際垂垂兩肉環。待得周環容徑尺，便誇氣概向人寰（穿珥貫耳，漸使之大，有中可容斗者，人以為豪）。（註三）

《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載：

> 穿耳每實以竹圈，圈漸舒則耳漸大，垂至肩，乃實以木板或嵌以螺錢；娶婦則去其束箍、摘其耳實。……番婦衣「几轆」、圍「遮陰」；耳穿五孔，飾以米珠，曰「鶴老卜」……。（註三）

足見本鄉男女均崇尚貫耳，男子尤其競比大耳，女子的耳洞多至五孔且飾以米珠、海螺等物。（註三；參閱圖 2-1～2-3）

貳、髮式與頭飾

平埔男子共有三種髮式，其一、散髮剪短（頭陀型覆額短髮），其二、梳一髻於頭頂或腦後，其三、梳二髻於頭之左右兩側。女子則束髮盤頭，或梳成一髻。一般而言，梳單髻、雙髻表示社會身份有別，單髻表示已婚，梳左右雙髻者未婚。至於頭陀

註三：沈茂陰，《苗栗縣志》，頁 122

註三：圖像 2-6 左手邊的神主牌位，分別供奉孫柯兩姓的歷代祖先；兩姓均書寫「銀同」作為祖源。孫家祖墳在大甲東番仔園，原無墓碑。柯姓祖先因被孫姓女祖招贅，因此，今日在孫家同時供奉兩姓祖先神主牌位。另，關於崇拜神主牌位的習俗，可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85 的相關討論。

註三：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 307。

註三：周璽，《彰化縣志》，卷九風俗志，頁 295-296。

註三：陳培桂，《淡水廳志》，〈社寮雜詩〉，頁 429。

註三：沈茂陰，《苗栗縣志》，頁 120-121。

註三：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 307。

先住民篇.tpf-24 7/9/2004 11:14:41

型則是孩童。（註三八）但《淡水廳志》記：

> 渡溪後過大甲社（即蓬山）、雙寮社，至苑裏社，……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註三九）

同書，頁三〇七又載：

> 蓬山番皆留半髮，傳說明林道乾見土番，則削去半髮，以為綰繩。番畏之，每先自削，以草縛其餘（「番語六考」）。（註四〇）

同書，頁四五四則載：

> 其服飾女結辮，男披髮、跣足，或翦髮散垂……。（註四一）

說明頭陀型的覆額短髮、半髮、披髮，均是本鄉土著常留的髮型；女性有時並結髮為辮。

本鄉土著除了「規樹皮為冠」外，喜戴竹節帽。但受漢文化影響後，土官也學戴漢人的絨帽。《淡水廳志》載：

> 其衣飾也：淡南剪髮至額，戴竹節帽。竹取其裏白，反而用之。高寸許，纏以紅絲，縛以烏絲，以白螺殼為方塊，可寸許，名曰「蛤達」；圍於頂。……會飲，土官多用優衣蟒服皂靴，漢人絨帽。（註四二）

至於平埔女性的頭上髮飾，常在髮際以一圈青紅相錯的花草為裝飾（稱頭箍）。（註四三）有些人則特別以紅色帶子，繫在髮盤底部（男人亦如此）。而出門插雉羽或雞尾，是表示體面之意，隆重儀式或平時場合，無論男女皆如此裝扮。（註四四）

參、配飾

平埔族的配飾比較簡單，除了前舉他們喜歡在頭上簪花結草、插雉羽或雞毛外，也極注意頸項和臂膀的裝飾。無論勞作、休閒或喜慶，絕大多數男女皆帶有項飾和臂飾，而善走的「雄麻達」所編五色篾束腹至胸，既方便奔馳，也可視為裝飾的一種。以上皆是平埔族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為其傳統文化，是區分平埔族與漢人的文化標誌。

至於其裝飾品的材質，以土產的貝、螺、銅、鐵為主，但本鄉土著的裝飾品也有由外地輸入的珠子、瑪瑙等。（註四五）《苗栗縣志》，卷七風俗志番俗，載：

> 頸挂瑪瑙珠，曰「璽忽因耶那」；……。（註四六）

瑪瑙珠串也有束於手者。（註四七）足為說明。

註三八：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頁305。

註三九：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7。

註四〇：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7。同書，頁381則載：「但番僅翦髮之半，仍以其半作髻，不似吳人之全翦耳。」

註四一：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六附錄三志餘，〈紀地〉，頁454。

註四二：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5。

註四三：陳培桂，《淡水廳志》，十五（下）附錄二文徵（下），〈社寮雜詩〉，頁429：「搜羅采色次浮誇，點綴都憑草木華。天為癡頑偏愛護，一年無日不開花（土番喜花，遇花則采垂垂華滿身，如瓔珞然，臺地暖，四時花不絕）。」

註四四：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頁18-19。

註四五：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頁21-22。

註四六：沈茂陰，《苗栗縣志》，頁120-121。

註四七：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5。

先住民篇.tpf-25 7/9/2004 11:14:41

肆、歌舞

平埔各族均能歌善舞，每遇祭儀即聚集村人暢飲，至酒酣時刻，乃相攜而舞，並高唱其部落所傳歌謠。《淡水廳志》記〈竹塹社土官歡番歌〉：

旺奇冉乞別焉毛嗒耶呼（社長請爾等來飲酒），打阿保留貓轆戈奇老久焉魯（我祖公最善捕鹿作田）。戈探耶林尤耶林真嗎吧搭藍（爾少年子孫當聽我教訓），由擺乞打休貓轆戈傳阿祿允（當學我祖勤謹耕捕）。打阿貓武呼別焉（土官就愛惜爾）。其耶林林毛嗒耶呼（還邀來飲酒）。（註四八）

平埔歌謠包括祝年歌、頌祖歌、耕種歌、打豬歌、祭祖歌、情歌、飲酒歌、待客歌等。除了晚期成品，如〈貓霧揀番社曲〉，（註四九）一般歌曲中皆充滿飲宴歌舞之快樂情緒，較少哀歌。平埔各族祭儀時所用樂器，有口琴、鼻笛、木鼓等。（註五十）茲附〈蓬山八社情歌〉，以為參考。

沉啷嘮葉嗄賓呀離乃勞（夜閒聽歌聲），末力吞戈達些（我獨臥心悶）。末里流布馬砌獨夏噫嗄喃（又聽鳥聲鳴想是舊人來訪）。達各犁目歇馬交嗄斗哩（是起去看卻是風吹竹聲），嗄下遙寧臨律嗄嘺噫嗄喃呀微（總是懷人心切故耳）。（註五一）

綜上所述，漢人大量入殖前，本鄉土著大甲東社人的經濟活動尚處維生經濟階段，其中狩獵與漁撈主要由青年男子負責，農業生產則以女人為主。以女子為中心的平埔母系家族結構，在家系承繼上，由女子繼承家產、傳承家系。然在部落組織中，男子又較佔優勢。自十七世紀荷人統治臺灣，尤其漢人大量入墾以來，本鄉本著社會漸次產生變化，尤其清領以後，其經濟生活、社會景觀變化極大，已非昔比。

註四八：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10。

註四九：茲錄〈貓霧揀番社曲〉以為參考：「不要變成漢人，我們的語言要珍惜；年老人和年長者都這樣吩咐：……你們忘掉番話，那裏配得上番人……要警惕，不要變成漢人！」見宋文薰、劉枝萬，〈貓霧揀番社曲〉，《臺灣專刊》3卷1期（民國四十一年，頁6-7）。

註五十：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70。

註五一：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風俗考，番俗，頁301。

先住民篇.tpf-26 7/9/2004 11:14:41

第九章 大甲東社人之社經變遷

第一節 外來勢力之介入

壹、西洋人之統治經營

歷史初期有關本鄉境土著村社的記錄，以十七世紀荷蘭治時期所留下的資料為最早。一六五〇年（明永曆四年）乃荷人統治的盛期，依據當時的戶口調查資料，全臺共三一五個村落，約一五、二四九戶／六八、六五七人，分屬北部、南部、淡水、卑南覓等四地方集會區（包括部份高山族）。大安、大甲溪下游地區的土著屬於北部集會區及淡水地方區，共十三村落，五八七戶二、五七九人。（註一）

理論上，統治力量所及之處，才能進行戶口調查工作，由表2-2所示，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的統治力量已達中部臺灣。（註二）然而荷蘭殖民者的租稅措施僅及臺中平原的貓霧揀社（一六五〇—一六五七年）與中部臺灣西海岸的牛罵社（一六四六—一六五七年）、大肚社（一六四六—一六五七年）。（註三）這意味著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本鄉境的大甲東社尚未受荷蘭殖民者的村落包稅（即賧社之稅）制度的影響。依據《臺海使槎錄》的說明：

> 賧社之稅，在紅夷即有之。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諸官集於公所；願賧眾商，亦至其地。將各社港餉銀之數，高呼於上，商人願認則報名承應；不應者減其數而再呼，至有人承應而止。隨即取商人姓名及所認餉額書之於冊，取具街市舖戶保領。就商徵收，分為四季。商人既認之後，率其夥伴至社貿易。凡番之所有，與番之所需，皆出於商人之手；外此無敢買，亦無敢賣。雖可裕餉，實未免於累商也。（註四）

由於遠離荷蘭母國的臺灣殖民者，當時被要求儘可能地以臺灣當地的收入來支持臺灣經營。其現地的租稅制度，主要沿習施

註一：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蘭時代的番社戶口表〉，頁210、220-221。十三村落指Aboan baris（蔴裡蘭）、Aboan Tarranoggan（東Aboan即岸裡）、Aboan Auran（西Aboan即烏牛蘭）、Aboan Poalij（樸子離）、Babausack（貓霧揀）Gomach（牛罵）、Salach（沙轆）、Bodor（水裡）、Dorid Amicien（北Dorida即北大肚社）、Dorida Babat（中Dorida即中大肚）、Dorida Mato,Camachat（南Dorida即南大肚社）、Warrouwar（大甲日南）、Tematanangh（大甲西勢，雙寮）。

註二：依據翁佳音的研究，荷蘭統治臺灣之前，臺灣中部曾有一個以Quata（柯達）王為首的跨部落統治關係或聯盟，由於十七世紀初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而瓦解。所謂Quata王即「大肚番王」，一六四五年左右，其所統轄範圍大約為大甲溪北岸臺中縣后里鄉之南至大肚溪流域間，地區涵括今天的臺中縣、彰化縣與南投縣部份地區。至於其族群，除柯達王自己的拍瀑拉族以外，包括巴布薩、洪雅以及巴宰等族，是一個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其鼎盛時期的勢力甚至包括大安溪南岸的道卡斯族，即桃園以南至彰化鹿港之間的二十七個村落。若十七世紀中葉的臺灣中部一如翁氏所考察存在一個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則表2-2的戶口資料或為透過柯達王所提出的資料，因此，雖有戶口資料，卻無租稅資料，蓋參與賧社之制的漢人需荷人保護，但荷蘭統治力量在五〇年代僅及中部海岸地區。參閱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183-175；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97-102。

註三：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282-283。

註四：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64。

先住民篇.tpf-27 7/9/2004 11:14:41

行於印尼的方法；（註五）以巴達維亞為首的公司領地，為減低行政費用並儘量避免因徵稅而引起的抵抗，直接波及當政者，早在一六二〇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採行由居留當地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等有力者，以承包的方式徵收各種稅收。依據《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載，臺灣的承包制最初實施於一六四一年（明崇禎十四年）九月，各種稅收中以徵收自中國人的人頭稅與實施於土著社會的村落包稅最重要，後者不只數額多且是統治實力的展示。

換言之，由公司村落包稅施行之處，足以作為統治者實力所及範圍的具體說明，也即說明終荷蘭在臺殖民期間，其統治實力並未廣及大甲東社的活動領域，施行於土著社會的「賧社」制自然也未推展及本鄉境。而大體上一六三〇年代的後期，原以安平作為對中國貿易基地的荷蘭人進而採取統治者的姿態，開始支配土著部落的行動，從事土地開拓與獎勵生產的活動。當時獵場分佈地以諸羅山（今嘉義）及Favorlang（今雲林縣一帶）等地方為最多。一六四〇年獵場以北部為主，但Doubl、Favorlang地區的土著仍常殺害中國人，（註六）則足以旁證本鄉境仍未有大量的漢人進入。

雖然十七世紀中葉，殖民者對臺灣中部的控制力仍不足保護持有官方執照進入土著生活領域獵殺鹿隻的漢人。事實上，（早在荷蘭入殖以前）已有中國漳、泉一帶的居民，進入土著部落，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等物品，與土著換取鹿脯、鹿皮、鹿角等物。（註七）對中國商人而言，鹿肉、鹿脯、鹿角為中國百姓所需；鹿皮則可出售給日人。此外，魚乾與籐也是中國商人所需物品。依據統計，一六二五（明天啟五年）年曾有一百艘中國的戎克船抵達安平，深入內地收購鹿肉、鹿皮等，並企圖經營漁業。中國人除了從事貿易外，可能已有定居某處專事收購戎克船所需物品的人。當時日人也已注意到臺灣的鹿皮並有戎克船來臺，因而雙方曾聯手抵制荷蘭的插足競爭貿易利益，並煽動土著與荷人戰爭。（註八）

如上所述，在十七世紀初葉尚處原始時代的臺灣，因歐洲人的到來，孤懸海外的臺灣島嶼乃被吸入當時已風靡世界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漩渦中。尤其南部臺灣在荷蘭人於一六二四年（明天啟四年）入殖以來，致力於貿易並推行殖產獎勵的政策下，藉由中國移民之力，鹿皮、米、糖的貿易空前發展；土著也已使用牛、犁開墾土地。然而荷蘭統治勢力雖向中部臺灣推展，僅止於沿海地區；換言之，至少十七世紀中葉，本鄉主角大甲東社人仍未受殖民者的控制，不過，早在一六四四年荷人統治勢力進入中部臺灣，可能已有少數中國移民在當地活動。一六四八年（明永曆二年）中國大陸因連續的戰亂，饑饉嚴重，臺灣的中國人驟然增加（約二萬人）。（註九）雖然當時大甲東社社會尚在荷人的賧社

註五：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259-320。當時以巴達維亞為首的公司領地之基本方針而言，首先在於追求貿易上的利潤；其次，在增強對海上商敵的物資掠奪；第三則在確立做為支配者的所得即現地的租稅制度。

註六：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97-102。

註七：沈有容，《閩海贈言》（原臺文叢五十六種，民國四十八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重刊），頁26-27。

註八：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86-87。

註九：依中村孝志的研究，一六四八年臺灣的中國人有20,000人，都從事於農業。但饑饉之後，約有8,000人返回大陸；參閱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63。

先住民篇.tpf-28 7/9/2004 11:14:41

制影響外，這並不表示該社會完全不受因鹿皮生產而逐漸形成的市場經濟的影響；中國移民也可能已在當地活動。可惜由於資料的限制，究竟有多少漢人進入大甲東社生活領域與部落民交易，無法進一步說明。不過，十八世紀初的大甲東社社會情形，透過官方文獻與志書等資料，仍可進一步勾勒。

貳、漢人入殖

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政權領有臺灣。清朝統治初期，「北路防汛，至半線（今彰化）、牛罵（今臺中縣清水鎮）而止」，（註十）雖然清廷已將武力推進至大肚溪以北的地區，其政治力仍相當消極。依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的記錄：

> 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註十一）

說明漢人入殖活動不甚活躍的情形；而康熙四〇年代，漢人移民的入殖勢力，已至北部淡水河流域一帶，但竹塹（今新竹）至南崁（今桃園），以及大肚、牛罵、大甲等中部海岸地區，卻「不見一人一屋」！暗示十七世紀以來，中部平埔族雖經荷蘭、明鄭政權的重創，仍存在一定的力量，足以反抗外力的入侵與入殖。（註十二）此外，由同處中部臺灣的臺中盆地貓霧揀山一帶卻「東有曠埔，漢人耕作其中」，亦足以證明西部海岸地區之尚未有漢人大量入墾，與土著勢力仍足以抗拒外力有關。（註十三）

大肚、大安兩溪下游地區（約為今臺中縣、市的範圍）的漢人入殖史，在其順序上，先開墾大肚山以西今大肚至清水之地，其次沿大甲溪東進開拓豐原、大雅及潭子一帶，再其次沿大肚溪抵達霧峰，而臺中市一帶是在三面包圍下最後被入殖者。然而例外的是今臺中市、太平鄉、大里市一帶，丘陵起伏甚大，岸裡社尚未請墾以前，原為貓霧揀社的活動範圍，十七世紀康熙中葉以後，漢入已入墾聚居，並在臺中平原南端形成「張興莊」。換言之，在康熙四、五〇年之間，臺中盆地、平原西南地方，已有漢人勢力進入，即舊址在大肚山後今臺中市南屯一帶的貓霧揀社，外來政權介入前，較早面臨漢移民的墾殖壓力；（註十四）當然此種形式的發展，與國家力量的先介入，漢人隨即進駐有關。（註十五）

註十：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10。

註十一：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20-21。

註十二：有關荷鄭對臺灣中部地區大肚溪以北的經營，可參閱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 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 188-145；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145-252。

註十三：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9。

註十四：貓霧揀犁頭店（今臺中市南屯）一帶早在鄭氏時期已有軍隊駐札於此，康熙五〇年代已有漢人耕作其間，五十六年並有官方與馬龍潭庄莊民（今臺中市西屯區）合築龍潭陂之舉。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 卷 3 期（民國八十一年），頁 188-189、208-213。

註十五：張興庄開墾者張國為泉人，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任北路營參將，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陞任福州守副將，開墾時間應在此時，也就是說張氏以武官身份墾拓張興庄。參閱尹章義，〈臺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臺北文獻》直字 59/60 期（民國八十一年），頁 202-203。又據莊吉發，〈故宮博物院現藏臺灣開闢檔案簡介〉（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辦「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座談會」，民國七十五年），頁 18，指張國闢墾張興莊應為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之事。

先住民篇.tpf-29 7/9/2004 11:14:41

漢人的入墾以國家力量為前鋒的情形，從十七世紀末葉以後中部海岸地區的漢人入殖史，可以進一步獲得佐證。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大甲溪北方崩山社群之吞霄社土官卓仆卓霧亞生，因不滿漢人通事黃申「征派無虛日」，而率眾抗官「殺申及其夥十數人」，引發「吞霄社事件」，為清治以來，中部海岸地區首次抗官事件。（註六）

吞霄社之役後，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臺灣發生洋盜鄭盡心潛匿淡水之事，清廷再設淡水分防千總，增大甲以上七塘於中部西海岸。（表2-4）其中吞霄塘（目兵十名）設在卓仆卓霧亞生抗官之處（即吞霄社口）。（註七）依表2-4所示，雖則中北部設塘（僅安兵者曰塘）、汛（設弁帶兵曰汛），以如此薄弱的兵力，負責轄境跨大肚、大甲、中港等溪流域的廣大範圍，在治安與震壓亂事上作用有限。（註八）難怪諸羅知縣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

> 大甲以上官兵，初至不習水土；又地方遼闊、塘汛寡弱，無事空抱瘴癘之憂，有是莫濟緩急之用。（註九）

然而當清官方稍增兵設防於中北部後，適逢移民渡臺禁令漸嚴之際，（註一〇）漢人移民依恃官兵的入駐，乃在康熙四〇年代以後漸次入殖大肚溪以北今臺中與桃竹苗地域。

漢人大量入殖以前，大甲溪北岸地域，早為大甲東社等崩山社群平埔族人所居，「溪北一帶地勢以高阜居多，番人多擇沃土而耕。耕種之地外，或為鹿場，或任其拋荒，番多不許漢人耕種。」（註一一）由於官軍的進駐，移民隨之而來，尤其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清廷部分解禁漢人對土著地的墾殖後，（註一二）漢民開拓活動，日形膨脹，侵食社人田園日益嚴重。

本鄉境之西，今大安鄉境大安港為中部地區僅次於鹿仔港（今彰化縣鹿港鎮）的重要港口，為大甲鎮一帶海運門戶，可與大陸直接往來，清代中國大陸移民入墾大甲溪北岸地域者不少由此進入平埔社地；漢人日多，拓地愈廣，相對地表示土著村社的獵場日縮。無論漢人所墾之地，或係荒埔，或已墾成，皆為平埔社地，因而引起大甲東、西等社人的抗拒；雍正九年（一七三一）遂爆發中部地方平埔族社首次最大之聯合抗清事件——大甲西社事件。

先後起事兩次（雍正九、十年）的大甲西社事件，以北路平埔族群大甲西社（今大甲鎮境）交結其東鄰樸仔籬（屬巴宰族社群之一）等八社為主力。除了本鄉境土著大甲東社等崩山社群之外，拍瀑拉族牛罵、沙轆、水裡及大肚社，以及巴布薩族阿束社也參與其事。經歷此役後，中部西海岸地域平埔社群的勢力可謂已完全衰退；不僅各族

註六：陳夢林，《諸羅縣志》，頁279。

註七：陳夢林，《諸羅縣志》，頁118。

註八：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五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11-14，以為並無作用。

註九：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頁110。

註一〇：由於移民渡臺禁令漸嚴，閩粵移民無法如先前一般採取「春時往耕，冬成回籍」的季節性移動方式，必須積極找尋可資墾荒、駐足之處。參閱《臺案彙錄丙集》，（臺文叢一七六種，民國五十一年），頁236。

註一一：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34。

註一二：雍正二年部議：「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耕種者，曉諭地方官，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參閱《欽定大清會典》，引自《清會典臺灣事例》（臺文叢二二六種，民國五十五年），頁43。

先住民篇.tpf-30 7/9/2004 11:14:41

表 2-4 康熙五〇年大肚溪北至鳳山溪間之塘汛

塘汛名稱	地點	目兵	設立年代	備註
大肚塘	大肚溪北	8	康熙五十年以前設	俱屬半線隨防把總兼轄
牛罵塘	東近岸裡、樸仔籬諸番	10	同上	同上
大甲塘	大甲溪北	5	康熙五十一年以後設	俱屬八里坌千總兼轄
猫盂塘		5	同上	同上
吞霄塘	吞霄社口	10	同上	同上
後壟塘	後壟街境	15	同上	同上
中港塘	中港港口之北	10	同上	同上
竹塹塘	竹塹城	15	同上	同上
南崁塘		10	同上	同上

資料來源：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18。

社人口、（註三）財物損失慘重，（註四）由於事後官方利用布、煙等禮物誘使「熟番」如岸裡社、後壟社等繼續追查逃亡的起事者，中部各平埔族社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尤其岸裡社成為官方新寵。

如上所述，十八世紀初，由於官軍的進駐大甲溪北，漢人移民隨之而來；惟因在地土著勢力尚足以抗拒漢人的入殖，移民尚未能放手展開墾殖工作。此一形式至十八世紀中葉大甲西社事件爆發後，始完全改變。而中部海岸平埔族社在大甲西社事件的大反抗上，不僅具有反抗清朝統治的性格，同時在攻擊漢人村落上，亦具有反漢人入殖的性格。（註五）而由各社群抗反時在其根據地大坪山（大安溪附近）叢林中儲備大量糧餉，可見其為生存而作殊死之戰的決心。（註六）

註三：依據荷蘭時期的番社戶口表，參與大甲西社事件的族社，依表 2-2 在一六五〇年時總人數約近 3,000 餘人（不包括苑裡、猫盂與雙寮等社），雍正九年（一九三一）大甲西社事件有 1,000 餘人被捕，死難者 300 餘人，其後又陸續被捕者約 700 餘人。而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各社人口，約 1,000 餘丁口（總人數應為 3,000-3,500 人之間），大甲西社事件對各社人口的成長應有所影響，可以想像。參閱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荷蘭統治下位於臺灣中部的 Quatang 村落〉，頁 223-197；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20-202；張士陽，〈雍正九、十年臺灣中の先住民の反亂について〉，《臺灣近代史研究院》6 期，（昭和六十三年），頁 35-55。

註四：官方在平亂中，常燒燬各社倉儲；事後也將各社武器沒收：番弓 300 餘、番箭 5,000 餘、番鹿鎗 9、鏢鎗 13 等。參閱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六—六十九年，20 輯），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郝玉麟奏，頁 549-551；雍正十年十一月七日王郡奏，頁 735-741。

註五：張士陽，〈雍正九、十年臺灣中部の先住民の反亂について〉，頁 5-55。

註六：張士陽，〈雍正九、十年臺灣中部の先住民の反亂について〉，頁 48。由此也反應平埔族社並非無儲蓄的觀念，雖然平埔人「室無居積，秋冬之儲，春夏罄之」、「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主因其平時自給自足，無需特別儲存物資之故，參閱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頁 35。

先住民篇.tpf-31 7/9/2004 11:14:41

第二節　經濟變遷與地權移轉

壹、經濟變遷

十七世紀荷人統治以來，由於長期獵捕鹿隻，以及十八世紀清代漢人大量入墾後，尤其雍正二年開放部分土著地後，土著一旦歸化清政府，漢人幾乎即可自由出入社域。隨漢人拓殖活動逐漸活絡，田園面積日增，鹿場減少，鹿隻減產，「昔之鹿場，今之民居」，影響土著經濟生活甚大；加以官方要求納餉（繳交人頭稅）的負擔，社人乃需學習漢人從事水稻等漢式耕作，並投入貨幣市場的經濟活動，以維持其經濟所需。（註二七）

雖然土著的原始農耕技術，歷經荷鄭的發展，已逐漸進入漢人犁鋤式的農業階段，使用耕牛、漢式農具並學習漢人築圳灌溉。除了開圳一方面所需資本龐大，一方面需要專門技術外，水稻耕種所需技術、知識及眾多勞力，亦多需借助於漢人。（註二八）

簡言之，土著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自外力介入後，漸次被破壞。先則荷治及明鄭時代的賦社制度，促使社人增加對外來貨品的需求量。其次，清代的稻米經濟更加速其經濟生活的改變，尤其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更改以往以社為單位、徵收鹿皮實物（即社餉），為以社丁為單位、徵收丁銀（每丁徵收二錢）後，土著的原始經濟更走向貨幣的經濟體系。（註二九）

總之，平埔社會不僅受貨幣經濟的影響，另方面也深受由粗放農耕進入集約深耕農作階段的困擾。隨著貨幣經濟體系與漢式定耕農作的發展，大甲東社人的經濟生活與昔時大異其趣。成書於清末的《苗栗縣志》，記：（註三〇）

> 大甲東社……皆久化之番。其飲食、衣服，與齊民無異……麻里力社……皆初化之番。其茹毛、飲血之俗，尚未盡除。

說明十九世紀以來，本鄉土著的生活與「初化之番」有所不同；且較近似漢人的生活方式。而在經濟生活的變遷上，最根本的改變莫過於土地的經營方式。

貳、地權移轉趨勢

歷史初期，臺灣中部地域為以平埔人為主體的社會，十七世紀以來，由於荷人、鄭氏王國先後入殖，影響各社群的發展，其主體性亦與日俱減。但真正促使中部平埔社會族群勢力變遷的關鍵，則為雍正年間的大甲西社事件；事後中部西海岸地帶的社群勢力徹底瓦解，從此再也無法形成大規模聯合抗拒外來統治與漢人入殖活動的力量。另一方面，漢人的大量入殖，逐漸成為平埔地域的地權主要擁有者；原以平埔人為主體的社會，也轉換為以漢人為優勢的世界。

此種改變，肇始於清康熙四十年代以後，於大甲西社事件以來急速發展，（註三一）完成於乾嘉年間。但漢人入墾大甲溪北本

註二七：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83。

註二八：同上。

註二九：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四志三賦役志，頁91。

註三〇：沈茂蔭，《苗栗縣志》，卷三建置志番社，頁49-51。

註三一：雖則漢人墾務深受此社會衝突的打擊；此由乾隆二十九年《續修臺灣府志》僅見「大甲庄」名，同一時代大甲溪南岸牛罵社域則已形成牛罵街、沙轆社域有沙轆街、大肚社域有大肚街，足以說明。參閱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89-90。

先住民篇.tpf-32 7/9/2004 11:14:41

鄉境以及今苗栗一帶崩山社域的活動，由目前所見契約文書，最早始於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吞霄社番土目加已、六觀等，因「乏銀應用」，合社眾招漢人徐光輝拓墾烏眉校力林圳面一帶東北二坑（今苗栗縣吞霄鎮烏眉里），其權力轉移代價為「大租粟十三石，價銀一百大員」。（註三）乾隆年間，大甲社土官巧自徵因「乏力耕作」，招漢人承墾中庄（今臺中縣大安鄉中庄村）的「墾單」，除了漢佃需繳交墾價銀二九二員外，並規定「大租首年十石，次年二十，三年三十，永為定例」。（註三）至於大甲東社人最早的給墾契約為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所立，較買賣契約發生之時間晚，（註三）極不同於一般認為平埔地權移轉先給墾次買賣的刻板印象。

簡言之，今日所見平埔契約文書應為漢人入殖一段時日以後的資料；即社人的土地移轉，早在契字流行以前已開始，目前契字所呈現的年代，僅僅表示社人與漢人雙方已開始以契約方式規定彼此的權力義務關係，雖則早期契約多由漢人代筆，且以漢語書寫。而乾隆以前，既無訂立規範雙方權利關係的文書契據，則漢人所墾者可能多為侵佔行為所得田地。（註三）然則土著的地權觀念，可能早在十八世紀初已開始。（註三）因此，當漢人移民逐漸增加，在雙方摩擦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乃爆發大規模的大甲西社武力衝突事件。

有關大甲東社人與漢人雙方所立開墾文書，茲舉一、二契字，資以說明：（註三）

(1)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二月大甲東社番潘阿木大宇仝立開墾永耕契字—

仝立開墾永耕契字大甲東社番潘阿木大宇有承祖父遺下楓埔壹所坐落土名至在牛埔仔庄東南畔東至卓家園為界西至車路柯家園為界南至卓家園為界北至大崙外卓柯園為界四界明白自己無力開耕今因乏銀別用愿甘苎埔出賣開墾先問房親不能承墾外托與中人向三塊厝庄漢人章岩官出手承墾仝中三面言訂墾埔價錢貳大員正其銀岩手內立即備出仝中三面交過番主阿木親收足訖其苎埔立即踏明界址交過買主前去掌管備用工本開耕成園永為己業　佃收租抵利木不敢阻當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苎埔係是木承祖父物業與房親無干亦無仝中典掛他人財物為礙如有不明為礙木出手一力抵當不干買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仝立開墾苎埔字契卷壹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章岩手內備出墾埔價銀貳大元正仝中交過阿木大宇親收足訖存炤

契字

註三：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第一節吞霄社契字編號1（A-2-p356-357）。

註三：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第七節大甲西社契字編號1。

註三：本鄉最早的買賣契為嘉慶二十一年，參閱本鄉志第十三篇文獻與掌故軼聞第四十三章古文書編號15。

註三：清代臺灣漢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方式甚多，其中以向官方請領荒地與霸佔最為常見。參閱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頁202-204。

註三：崩山八社人也有地權觀念，此由社人除了「擇沃土而耕」外，大甲溪北一帶（地勢以高阜居多）的土地，「或為鹿場，或任其拋荒，多不許漢人耕種」足以說明。其惟與漢人接觸前的部落共有觀念與漢人進入後始發展的私權觀念有所不同。參閱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北路諸羅番九，頁134。

註三：參閱本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古文書。

先住民篇.tpf-33 7/9/2004 11:14:41

再批明內添註親字共三字批炤
悔字
代筆（印二）　　在場（印一）
為中（印三）
同治元年二月　日立開墾永耕契字大甲東社潘阿木大字

印一：麻薯舊屯給□社屯目潘茅格大完戳記
印二：□□社眾舉白土茅□圖記
印三：潘□汝信記
其他：此契填給第號紅單對訖光緒拾伍年四月大甲局蓋戳

(2)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月大甲東舊社番婦阿末淡眉立給開墾永耕水田荒埔契字—

立給開墾永耕水田荒埔契字大甲東舊社番婦阿末淡眉有承祖父遺下水田荒埔壹段坐落土名大甲東社前東至土目郡乃蓋鏊田為界西至蒲氏烏毛田為界南至山下竹頭為界北至石埤為界四至界址踏明併帶泉水通流灌溉充足逐年配納大租粟壹斗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水甲荒埔出墾先問盡番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大甲街王瑤記出首承墾三面議定時值開墾永耕價佛銀參拾大員正銀即日仝中親收足訖其水田荒埔隨即踏明界址交付瑤記前去掌管自備工本開築成田永為己業任從自便阿末淡眉自給墾以後永斷割籐日後及子孫等不敢言及找贖保
此水田荒埔係承祖父遺下物業與別番無涉亦無重張掛借他人財物不明等情如有不明等情事阿末淡眉一力出首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仁欺交關二比甘愿各無迫勒反悔異言恐口無憑合立給開墾永耕水田荒埔契字一帋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收過開墾永耕契字壹帋內佛銀參拾大員足正訖又炤
代筆人　謝以佩
為中番（印一）
在場番（印二）
同治拾參年拾月　日立給開墾永耕水田荒埔契字番婦　阿末淡眉

印一：大甲東社東正義信記
印二：敦仔蚋觀信記

依以上契文所示，透過土地經營，最初平埔族社可能在繳交社餉之外，尚有餘力維持水平之上的生活，甚至較之一般漢人富裕。（註三）然而這類土地招墾之初，名為「給墾」，實則帶有永耕性質，漢人只要如期向土著業主繳交租稅，常可無限期的耕墾；平埔業主固然也有承賸土地，進行拓墾者，（註三）惟坐收租稅者可能不在少數。而隨著漢人勢力的擴張，平埔族社與漢民族的競爭，無論土地經營或貨幣經濟、市場體系活動，多半較居劣勢；並且社人在乾隆年間人口有增加趨勢，為了維持需求（如

註三：實際狀況因崩山社群所留文獻資料有限，無法說明，但可參閱臺中盆地岸裡社人所留下的《岸裡文書》（臺大圖書館藏）；另相關論述可參閱洪麗完，〈異族接觸與南島民族之「文明化」：十八世紀後半葉岸裡社群社會文化之探索〉，頁29。
註三：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第一節吞霄社契字編號2。

先住民篇.tpf-34 7/9/2004 11:14:41

社餉的負擔、人口增長（註四十）），平埔族社不斷招墾或賧耕，甚至開始典、（胎）借或杜賣土地給漢人，此由本鄉志第十三篇第四十五章第一節收錄的契字，各種土地關係產生的理由除了給墾字與典契上的「無力開耕」外，以「乏銀費用」、「乏銀別創」的狀況為主，足以說明。

以目前所見契約文書，大致上，大甲東社人的土地買賣行為，始自嘉慶年間，尤其以光緒年間最為盛行；承買人以漢人為主，但也有社人買地之例，如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大甲東社番林武力未老等，因「乏銀別創」，出賣井子頭（在本鄉境）的水田，由同社番親斗肉淡眉以價銀 24.5 大員買入，（註四一）說明平埔人從漢人經驗中學習經營土地的實況。然則無論開始於嘉慶年間的買賣契，或道咸同光年間的給墾字、典契等的田土地點，均圍繞在大甲東舊社、新社附近一帶地區。此與一般土著地權移轉的趨勢，在清代水利設施與防洪技術不甚發達的時代，因漢人耕墾地點的選擇，主要考慮地力佳與無水患的因素，清代中末葉能被保留下來的社地，多半屬於遠離舊社的低地與旱地之趨勢，極不一致；（註四二）此或與大甲東社域的地理位置離海較遠（處於「風頭水尾」之地；地力不佳、水源不足）有關。（註四三）而崩山社群於十九世紀初開始的社域外遷移活動（移往宜蘭平原），大甲東社並未參與，直到半世紀以後始參加中部平埔族移住埔里盆地的活動，此亦似可說明漢人勢力較晚進入大甲東社社域、社人的生活空間較晚受到壓縮的情形。（註四四）

如上所述，因漢人入殖，社人不斷移轉土地權利；隨著漢人的移入、定居，漢莊日益成長，並形成漢人街市，如在平埔村社大甲東社附近形成漢人莊落大甲東莊，說明土著與漢人勢力消長情形。就地權移轉趨勢而言，在年代上，大甲東社的土地買賣年代不盡然較給墾的年代晚，且存在給墾、杜賣、典胎借同期盛行的狀況。在地點上，漢人入殖平埔社域，可能先在舊社附近立足，形成漢庄；（註四五）平埔社人則隨漢人墾拓活動的開展棄舊居另立新社（番社）。

第三節 土著社會風貌之改變

大體而言，不同族群的接觸，常帶來文化的交流、互動；大甲東社人的文化、社經變遷尚包括外來統治者之有意改風易俗，

註四十：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第一節吞霄社契字編號 5，道光十九年吞霄番通事莫加袍等因「合社生齒日繁，口糧缺乏，又乏力墾闢」，將在青山番仔寮坑及長潭坑（似今桃園縣大溪鎮瑞源里、龍潭鄉大平村）的屯地，以八十元的代價，十二年的無租墾荒期，成熟之日始要求每甲土地付大租口糧谷八石的代價，與漢人吳思衡等立「招總墾約字」。

註四一：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第八節大甲東社契字編號 15。

註四二：參閱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研究》4 卷 1 期（民國八十八年），頁 49-96；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頁 15-28、3-17。

註四三：參閱本鄉志第一篇自然環境。

註四四：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 87-95。

註四五：乾隆六年成書《重修臺灣府志》，頁 80，載崩山社域有崩山八社、兩個莊（猫盂印斗莊、吞霄莊）；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75-76：「猫盂莊（距廳八十五里）、宛里莊（距廳七十二里）、……吞霄莊（距廳七十里）、房里莊（即蓬山莊。距廳九十六里）、山柑莊（距廳九十五里）、日北莊（距廳九十七里）、大甲莊（距廳一百里）。大甲德化社（距城一百里）、大甲東社（距城一百里）、日南社（距城九十里）、日北社（距城九十里）、雙寮社（距城九十里）、房裡社（距城八十五里）、貓盂社（距城八十五里）、苑裡社（距城八十二里）、吞霄社（距城七十五里）……。

先住民篇.tpf-35 7/9/2004 11:14:41

迫其接受己方文化的因素。其中當也存在時勢所迫，如漢人經濟壓力及其較優勢的人口、社會力量的滲透等重要推動力，或亦有傾慕漢文化的情形。

有關大甲東社人的經濟變遷前以論及，勿庸贅述。以下茲由官方的政治措施及社會風俗的轉變等方面，敘述十八世紀以來，大甲東社人的社會風貌改變圖像。

壹、官方之政治措施

一、社學

清初官方政令僅及臺灣南半部沿海平原區，對於土著的治理仍沿荷鄭之舊，僅對歸化「土番」施以安撫措施，態度頗為消極，尚無何「理番政策」可言。大抵，統治上側重歸化土著的保護，任其自治自理並行漢「番」隔離政策。而清廷領臺以來，對漢人防範極嚴，尤其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朱一貴發動臺灣漢人首次武力抗清事件之後，對漢人疑懼尤深，因而極力籠絡土著以為控制漢人之資。故對土著除撫綏外，尤重視其教育，大致上擬藉教育以改變平埔諸族觀念及思想與漢人一樣。

臺灣土著的官方教化工作，始自荷治時期。惟大甲東社社學的設立為雍乾年間之事。（註四六）清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臺灣道張嗣昌建議南北兩路各「熟番」設「土番」社學（由在地移住漢人中選出精通文理者為社師，並供給住屋及食物膏火）教育「番童」，大甲東社設「社學義塾」一所。（註四七；圖像 2-7）

至於教化的成效，分巡臺灣道（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四年）伊士琅《臺灣志略》指：

> 數十年來浴聖化之涵濡，漸知揖讓之誼，頗有尊敬之心，多載冠著履，……講官話及漳泉之鄉語，與漢民相等，且各社遵設學延師教訓番童，講明經禮義課讀詩書。各縣訓導督率其事，按季考驗以獎勵，幾同民之俊秀。（註四八）

雖則所謂「漸知揖讓之誼，頗有尊敬之心」乃官方立於宣導教化成效的說法（其中亦含有優勢文化的驕傲），並不能充分說明平埔社會因受「聖化之涵濡」而引起的本質變化。大甲東社人擁有本身的社會秩序，如年齡層組織；尊老、敬長為其社會特質之一，並不需接受教化始有揖讓、尊敬之心。

至於語言的變遷、書寫文字的傳入，卻是土著社會文化變遷極關鍵的發展；共通的語言不僅促使不同語言群間的溝通、社群互動增加，且漸漸不需假漢人之手，直接與官方互動。文字的應用不僅改變其往昔「互市或有賒貨，皆以結繩代券」的方式，（註四九）而能投入貨幣、市場經濟體系；在與漢人的土地關係上，土地契約文書的締結亦逐漸不需假手漢人之手。

惟社學後來以費用不足，「理番」官又不經意，嘉慶年間逐漸荒廢，迄道光時土著接受漢文化的洗禮越深，「番童」入當地漢民義學或書塾讀書已成風氣，無需再施予特殊的教育，「土番」

註四六：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八學校，頁 362。另，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 514；《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民國五十四年），下卷，頁 594。

註四七：沈茂陰，《苗栗縣志》，卷九學校志義塾，頁 151。

註四八：引自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六風俗，頁一一八。

註四九：陳培桂，《淡水廳志》，〈番俗近古說〉，頁 380。

先住民篇.tpf-36 7/9/2004 11:14:41



圖像 2-7 社師（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社學的制度，幾至中絕。（註五十）

二、賜姓

平埔社會自十七世紀荷人統治臺灣以來，漸次產生變化，尤其十八世紀清領以來，漢人入墾土著地的潮流與官治力量的介入，對分佈於西部平原的平埔諸族社會文化的改變，影響尤大。其中以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的賜姓，為官治力量企圖積極影響土著文化之一具體措施。（註五一）

土著本無姓氏，吳子光《一肚皮集》載：（註五二）

> 相傳土番未得姓時，有點者欲用夏變夷而未得其方；漢人紿之曰：「姓未易討好也。唯『潘』字有水、有米、有田，姓莫如『潘』宜。」

此為賜姓之一說法。賜姓種類包括潘、蠻等五十種之多。（註五三）有關大甲東社人接受官方賜姓的確切年代及最初所賜漢姓為何，現已不可考。然其全面接受漢式姓名的年代，應不早於清末之前。依據留存民間的古文書資料，直到光緒年間仍有部份大甲

註五十：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598。

註五一：官方的政治措施，約包括教化工作、改變行政體制（屯田）及賜姓等。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72。

註五二：吳子光，《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史蹟中心，民國六十八年），卷之十八序。又《安平縣雜記》（臺文叢五十二種，民國四十八年），指：「至清乾隆間招撫歸化，其時政府委用官員係潘、金、劉三姓之官，入出招撫，凡在其時就撫之各社生番出山化熟者，如是潘官所招，一概隨同姓潘；金官所撫，一盡姓金；劉官所撫，一盡姓劉。」

註五三：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653-657、659。

先住民篇.tpf-37 7/9/2004 11:14:41

東社人保存其舊有姓氏稱法，如加已田螺、東江仔四老。（本鄉志第十三篇文獻與掌故軼聞第四十五章第一節平埔文書）其後裔姓氏之多，目前所知包括東、潘、葛、柯、陳等，其中以東為較多人採用之漢姓。（註五四）

三、屯制之設

依據清代方志資料，十八世紀六〇年代蓬山社（崩山社）與後壟社、竹塹社、淡水社、哈仔難社，並稱淡水廳五大社。《續修臺灣府志》載：

> 乾隆二年，社餉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二錢），實徵大社五社（內附小社二十四社），……（內蓬山社……等社番丁共三百五十，後龍社……等社番丁共三百零七，竹塹社番丁八十九，淡水社……等社番丁共五百七十九。哈仔難社……。）（註五五）

除了官方徵收社餉外，五大社是否在社群與官方互動上，如中央政令的下達或統治策略執行上，扮演某種角色，不得而知。然而乾隆年間因「熟番」土著幫助清廷平定林爽文之亂有功，由大將軍福康安奏准，於乾隆五十五年仿四川屯練之制，在全臺九十餘「番社」中挑選精壯「番丁」為守邊武力。屯制施行後，淡水廳五大社與官方的互動關係有了新的發展。

屯制在於以「熟番」為屯丁，「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盜賊」；其設計為「戶口數少之社，或數社併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註五六）依此原則，大甲東社與蓬山社群的德化社、日南北、雙寮東勢等社，併入日北小屯（共五小社；包括屯丁三〇〇名），雙寮（西勢）社、宛裏、猫盂、房裏、吞霄等社，與竹塹、後壟、中港、新港、貓閣（猫裡與嘉志閣合併）等社，以及南崁四社的霄裡社併入竹塹大屯（十一小社；屯丁四〇〇名）。而日北社之設日北小屯，乃基於「日北社，近於火燄山腳，為險闢之區」；竹塹社與武勝灣社則分別以「近北路邊中之地，戶口繁廣，應設一大屯」、「近在臺灣邊海，應設一小屯」組成竹塹大屯與武勝灣小屯。（註五七）換言之，淡水廳五大社只有竹塹社仍為屯制新權力結構中的重要社群，至於五大社之蓬山為日北、淡水由武勝灣取代，哈仔難地區則非屯制設置區。

由於屯制之設，不僅官方與「熟番社」的互動關係改變，平埔社群間的關係也有所變遷。設屯之前，基於「南北兩路，近險要處甚多」，為了防禦地方，官方原「撥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為隘丁。」（註五八）但隘丁未完全納入國家管理體系。設屯之後，番屯正式被制度化、官僚化，並納入國家軍隊的一部份，「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落」。（註五九）在屯制的部署上，包括竹塹社北邊後來被研究者劃歸為凱達格蘭族（Ketagalan）的霄里社，與道卡斯族社三大群的屯丁，全歸屬於竹塹大屯與日北小屯轄管；

註五四：其中以東姓居多，參閱《日據時期本籍戶口調查簿》、《日據時期本籍戶口除戶簿》、《日據時期寄留戶口除戶簿》，1-39冊（外埔戶政事務所提供）。

註五五：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263。

註五六：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318。

註五七：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334。

註五八：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318。

註五九：如屯丁給予養贍埔地；為管理屯丁，各屯設屯弁，給予屯餉等措施。參閱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320-350。

先住民篇.tpf-38 7/9/2004 11:14:41

其中大甲東社等蓬山社群分屬於日北小屯、竹塹大屯轄下，此後無論在屯兵的調動與管理、屯地的分撥配置，或策應其他公務上，與過去因餉稅、語言差異而分的三大群，（註六十）產生新的互動「結構」。此由乾隆五十五年以來，契據文書中常出現的「竹塹屯十社」、「日北屯五社」的用詞，足以說明。

由於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當發生通事、土目等公職人員之弊端時，乃有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五月竹塹屯總董事解大賓、日北屯總董事潘德順聯名向官方「請革通土，準舉頭目，以除積弊」，即原由社人選出，經官方給戳認可的「番社」公職人員通事、土目等，變成由竹塹屯總董事與日北屯總董事聯名向官府陳情革除，並另立頭目以運作社務的權力關係。（註六一）

此外，社群互動也有所調整，如雙寮東西社原為同一部落的分支發展，由於其屯丁分屬於日北小屯、竹塹大屯，光緒十四年六月乃有竹塹屯總董事解大賓、外委邵長發同雙寮西勢社（無雙寮東勢社）、宛裏社、猫盂社、房裏社、吞霄社等屯眾，向新竹縣正堂具僉舉稟「為遵飭舉妥，扣準驗充給戳，以便奉公事」。（註六二）

簡言之，由於清廷於十八世紀九〇年代在臺實施「屯番制」，蓬山社群被劃屬竹塹大屯與日北小屯，除了崩山社群的房、盂、宛、吞與雙寮西勢社外，屬於竹塹大屯的社群尚包括竹塹與後壟四社、霄里社，因而形成「竹塹十一社」與「日北五社」的跨社群關係。

理論上，因屯制施設，使不同社群處於相同屯所、養贍埔地，日久對於彼此的了解自然有增進作用，尤其對於原本社域不相臨的族社，社群的互動可能因而多起來。如遠在桃園沖積扇的霄裡社、新竹平原的竹塹社，與苗栗丘陵地的崩山社群等隔後壟社群領域而居；由桃園沖積扇，經新竹平原，到苗栗丘陵、大甲平原，地理上有一段距離，其間為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吞霄溪、房裡溪、大安溪所隔。由於諸溪流河床坡度大，水流湍急且多礫石，常成為南北往來的阻礙，活動於其間的平埔社群彼此間的交通應非頻繁。乾隆末年以來，由於竹塹大屯轄下各社為執行屯番任務並經營養贍埔地，日久彼此間的互動必有所增加。（表2-5）

然而清廷規劃屯地之初，早已慮及社群活動領域的接連、社群往來關係等因素，因此將日北等蓬山關係社群、竹塹與地理上接連的後壟社群、蓬山其他社群，以及社群往來多的霄裡社置於同一屯所／養贍埔地，即社群互動早在屯制施行前已存在。（註六三）其次，由於竹塹大屯與日北小屯的養贍埔地離社遠，屯丁無法自墾，而養贍埔地零散，共享同一養贍埔地的社群為數有限且多半為原社域近鄰的關係社，屯制對竹塹等三大社群的互動、了解，多少或有促進作用，但就十九世紀崩山社群未往北參與竹塹屯下各社的移住活動，反而南下加入十九世紀中部平埔大規模的遷徙活動而言，似乎屯制在建立新的跨社群互動上的效果不大。

註六十：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九〇年），頁209。

註六一：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附錄：跨社文書，編號21、22。

註六二：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附錄：跨社文書，編號23、25。

註六三：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第三章的論述。

先住民篇.tpf-39 7/9/2004 11:14:41

表 2-5　北路屯制竹塹大屯、日北小屯佈署情形

			大小屯	所屬社群	屯丁額	屯丁總數	養贍地				行政轄屬
							地點	今地名	每人甲數（甲）	總甲數（甲）	
千總潘明慈	把總錢茂祖	外委	竹塹大屯	※竹塹社	95	400	淡水廳武陵廳	桃園鄉龍潭鄉	1.58	154.1	淡水廳
				※房裏社	44				1.68	154	
				※宛裏社	12					104.4	
				※貓盂社	8						
				※吞霄社	25						
				※雙寮(西勢)社	40						
				※霄里社	20						
				※後壟社	39		淡水廳芎蕉灣	苗栗縣銅鑼鄉朝陽村	15+	45	
				※新港社	52		淡水廳芎蕉灣內灣三灣	苗栗縣銅鑼鄉朝陽村、三灣鄉三灣村與內灣村	1.14+	28.2 22.36 8.83+	
				※貓閣社	30		淡水廳鹽水港	新竹縣香山鄉鹽水村、南港村、內湖村	1.11+	70.42	
				※中港社	30						
		外委	日北小屯	※日北社	70	300	淡水廳馬凌埔	似桃園縣龍潭鄉三林村、上林村	1.68+	118	
				※日南社	74		淡水廳馬凌埔黃泥塘	似桃園縣龍潭鄉三林村、上林村與高塘村、中山村	1.69+	75 50	
				※大甲東社	40		淡水廳黃泥塘	桃園縣龍潭鄉高塘村、中山村	1.67	66.8	
				※大甲西社	40					66	
				※大甲中社	32		淡水廳四方林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村	1.9+	61	
				※雙寮(東勢)社	44		淡樂廳黃泥塘淮子埔	桃園縣龍潭鄉高塘村、中山村、佳安村		2.95 44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台北：古亭書屋），頁 351、375、379。

說　　明：（1）北路屯千總一人分給埔地十甲（在彰化縣屬罩蘭，今苗栗縣卓蘭鎮）。
（2）北路屯把總一人分給埔地五甲（在淡水廳屬武陵埔，今桃園縣龍潭鄉）。
（3）日北小屯屯外委一人分給埔地三甲（在淡水廳屬馬陵埔，似今桃園縣龍潭鄉三林村、上林村）。
（4）竹塹大屯屯外委一人分給埔地三甲（在淡水廳屬武陵埔）。
（5）打“※”者為崩山社群；“+”表示超過之意。

先住民篇.tpf-40 7/9/2004 11:14:41

換言之，就處於相同養贍埔地而能促進社群的了解，進而促成中部平埔族的跨社群活動之觀點而言，蓬山社群的例子，是一個例外。

總之，蓬山社群與大甲溪南岸的跨社群關係在屯制施行前早已存在。而蓬山社群與大甲溪南岸的跨社群關係似乎仍未被屯制施行以來新社群互動結構所取代，這種現象由大甲東社等崩山社群之加入大甲溪南岸的中部平埔大遷徙活動似可說明。（本章第四節「遷徙活動」）

貳、社會風貌之轉變

本鄉土著與漢人接觸後，其社會風俗深受漢人的影響，《淡水廳志》載：

> 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生齒漸衰，村墟零落。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誘而馴之，罔不遵禮義之化也。（註六四）

足見清中末葉，大甲溪以北的土著，無論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器用等，皆已半從漢俗；大甲東社亦不例外。

以婚姻關係言，「凡近邑之社，亦有知用媒妁聯姻行聘；女嫁於外，媳取於家。」（註六五）其母系社會結構亦已漸有父系社會之風。（註六六）在語言上，由於平埔族群無文字用以流傳其本身語言，接觸漢人後，很快失去其特質，因而日久「多講官話及漳、泉鄉語」。由於本鄉移入的漢人以閩人為多，大甲東社人所受漢文化的影響乃多為閩南文化，語言亦以閩南語為主，少數為客語。（註六七）

以上有關大甲東社人的社會風俗與宗教生活的變遷，詳細情形可參閱本鄉志本篇第八章與第十篇宗教信仰篇的討論。

第四節 遷徙活動

平埔族的經濟生活以山田燒墾並從事狩獵、漁撈與採集野生植物的種子、植物纖維為主（也種植根莖類作物）。基於狩獵、遊耕，以及習俗、信仰上的因素，早期土著部落十分習於遷徙，但多限於社域內且為部落性的移動。而荷鄭以來，鹿隻過於獵捕，尤其十八世紀漢人拓墾勢力的拓展、大量入居以來，壓縮土著生活空間，一方面促使土著遷離舊社，重建新社，如本鄉境大甲東社部落由舊社遷徙新社（「番社」）多緣自漢人的拓墾壓力，「番社」名稱也由漢人所給。另方面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土著固有狩獵與遊耕範圍日受局限及受漢式定耕的影響，原始移村易地耕種的方式，漸感困難，土著部落逐漸放棄再遷村的舊習。清乾嘉年間以後，土著聚落乃逐漸成為固定性集村。

換言之，漢人的土地拓墾活動既是造成土著遷居之因，逐漸地也成為限制其移徙的因素。因此，直到十九世紀社域外的移居

註六四：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番俗，頁306-307。

註六五：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六風俗，頁118。

註六六：關於本鄉大甲東社人的母系社會結構，以及其走向父系社會的過程，並無具體資料足以論證，惟其變遷情形應與原居在清水平原的沙轆社相去不遠。請參閱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頁85。

註六七：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49-96。

先住民篇.tpf-41 7/9/2004 11:14:41

環境與客觀條件成熟，得以進行社域外的遷徙活動，土著再也極少可能進行原始社域內的遷徙行動。（註六）清代大甲東社在社域外的移動，依據史書記載，主要為參與道光年間以來中部平埔社群的入埔活動。

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部平原盆地地區的開發工作，已漸次完成。由於地理形勢的阻隔，相對於西部平原的大量拓墾，十八世紀乾隆末年埔里盆地尚處未開闢狀況。（註七）因而當西部平原的開墾活動已近飽和狀態，急於找尋可耕土地的漢人與西部平原生活空間日被壓縮的平埔人，均欲進入此一官方禁墾的地域。

十九世紀中末葉，中部平埔社群的移居埔里盆地，以活動於大甲溪以北的蓬山社群，與活動於大甲溪以南至濁水以北的中部平埔族社為主。中部平埔族入埔以前，除了漢人郭百年與田成發（萬斗六社（註八）通事）事件為有計劃的私墾活動外，可能已有零星的個人進入埔里盆地內活動。（註九）大致上，由於社址與養贍埔地位置的地緣關係，鄰近埔里盆地的平埔族，率先有機會與埔里盆地的土著們接觸，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萬斗六社因此成為入埔先鋒。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各族社在日月潭土著思貓丹社（水社）的中介下，入墾蛤美蘭社（埔里社）社域。由於埔里盆地當時仍屬「番界」禁地，蛤美蘭社招墾西部平原各族社之舉，法律上屬違法行政，但官方並未採取一如往昔對漢人強制驅逐的行動，反而頗為諒解土著地主埔社曾遭漢人郭百年劫殺，欲援引西部各族社為奧援的處境。因此，各族社入埔之舉始成為可能。

前舉兩次移居活動外，各族社入埔活動以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第三波的移徙規模較大，參與的社群較道光四年多。（註十）蓬山社群中除了日北社參與道光八年的移居活動外，大甲東社與其他各社（包括日南、雙寮、房裡、苑裡等社），均在入埔形勢略定後，始移入（中部平埔族入埔之舉，約可分成四、五波，大甲東社約在各社入埔中期移入）。（註十一）

依據表2-2所示，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大甲東社的屯丁數額為七〇，而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其屯丁四〇，顯然人口數額有所流失。流失人口當與大遷徙有關；而其移居時間應不早於同治年間，晚於光緒十九年。人口流失也可能因族群認同變遷或婚姻網絡而改變（平埔女子與漢人婚配則入漢籍），影響其戶口統計的結果。無論由明治年間的統計資料、戶籍舊簿、田野調查等資訊，均證明大甲東社人的移居活動，僅部份社人參與，並非廢社他遷；目前仍有部分社人後裔定居本鄉境，多半均知道身為大甲東社人的後裔，雖則其中部份人士不願外界知悉其祖源。（註十二）

註六：有關平埔族社階段性移居活動性質的相關論述，請參閱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49-96。

註七：姚瑩，《東槎紀略》，頁32-33載：「蓋埔里乃界外番社，例禁越墾，故漢人圖墾，則假名於水沙連耳。」又關於埔里盆地的開墾與西部各族的移入關係，參閱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頁204-253。

註八：姚瑩，《東槎紀略》，頁34-35；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頁107-114。

註九：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頁117，表2。

註十：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頁127，表6。

註十一：參閱本文表2-2，與《本籍戶口調查簿》、《本籍戶口除戶簿》、《寄留戶口調查簿》，共39冊（外埔戶政事務所提供）。

先住民篇.tpf-42 7/9/2004 11:14:41

表 2-6 崩山社群遷徙表

社名	舊社址	新社址	社域外之移往活動	社域外之移住地
吞霄社	苗栗縣通霄鎮通東里、通西里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里	嘉慶九年「流番」移往宜蘭平原	
			咸豐十一年（1861）移往埔里盆地	八股
苑裡社	苗栗縣苑里鎮苑東里、苑西里、苑南里、苑北里、西平里	苗栗縣苑里鎮苑裡里	道光年間移住埔里盆地里	
猫盂社	苗栗縣苑里鎮中正里、客庄里、苑坑里、水波里		傳說乾隆中葉移住今通霄鎮境（待考）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
房裡社	苗栗縣苑里鎮房裡里		道光二十四年（1844）移住埔里盆地	房里
日北社	苗栗縣苑里鎮舊社里	苗栗縣苑里鎮蕉埔里（先在大埔，再移芎蕉坑）	道光三年（1823）移住埔里盆地	日北、下史港坑、上梅樹腳
日南社	台中縣大甲鎮 幸福里、太白里		道光十六年（1836）移住埔里盆地	日南
雙寮西勢社	台中縣大甲鎮建興里		道光三年（1823）移住埔里盆地	雙寮、牛相觸
雙寮東勢社	台中縣大甲鎮建興里			
大甲東社	台中縣外埔鄉大東村	台中縣外埔鄉中山村	道光八年（1828）移住埔里盆地	
大甲西社	台中縣大甲鎮德化里	台中縣大甲鎮頂店里	嘉慶九年「流番」移住宜蘭平源	

資料來源：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文獻叢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七年），頁 88-89。

綜上所述，歷史初期中部地域為以平埔人為主體的平埔社會，十七世紀以來，由於荷人、鄭氏王國先後入殖，影響各社群的發展，但真正促使中部平埔社會族群勢力變遷與社群互動的關鍵，則為雍正年間的大甲西社事件；中部西海岸地帶的社群勢力徹底瓦解，此後再也無法形成大規模聯合抗拒外來的統治與漢人的入殖活動。漢人的大量入殖，逐漸成為平埔地域的地權主要擁有者；原以平埔人為主體的社會，也成為以漢人為優勢的世界，此種改變，肇始於清康熙四十年代以後，於大甲西社事件以來急速發展，完成於乾嘉年間。而十九世紀當平埔生活空間備受壓縮，各社群展開大遷徙活動時，部份大甲東社人也加入中部平埔社群移住埔里盆地的活動。惟無論仍在原鄉駐足或成為移民的社人，其傳統文化多已散軼許多，雖則多數族裔尚知本身所由來。茲以〈熟番歌〉作為本篇總結，並作為大甲東社人歷史變遷之一見證：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晝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民父母者慮其後。（註五）

註五：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五（下）附錄二文徵（下）〈熟番歌〉，頁 437。

先住民篇.tpf-43 7/9/2004 11:14:41

參考文獻及引用書目

壹、中文

一、史料文獻

1. 不著撰人，《臺案彙錄丙集》（臺灣文獻叢刊一七六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文叢」，民國五十二年）。
2. 不著撰人，《平埔番調查書》（明治四十二年）。
3.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文叢五十二種，民國四十八年）。
4. 不著撰人，《岸裡文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5. 不著撰人，《欽定大清會典》，引自《清會典臺灣事例》（臺文叢二二六種，民國五十五年）。
6. 不著撰人，《本籍戶口調查簿》、《本籍戶口除戶簿》、《寄留戶口調查簿》，共39冊（外埔戶政事務所提供）。
7. 外埔鄉公所編，《外埔鄉行政區域圖（1/11,000）》（臺中：外埔鄉公所，民國四十八年）。
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文叢一二一種，民國四十八年）。
9. 吳子光，《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史蹟中心，民國六十八年）。
10. 沈有容，《閩海贈言》（原臺文叢五十六種，民國四十八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重刊）。
11. 沈茂蔭，《苗栗縣志》（臺文叢一五九種，民國五十一年）。
12. 周　璽，《彰化縣志》（臺文叢一五九種，民國五十一年）。
13. 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20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六—六十九年）。
14. 陳夢林，《諸羅縣志》（臺文叢一四一種，民國五十一年）。
15.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文叢四十四種，民國四十八年）。
16.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文叢六十五種，民國四十九年）。
17. 余文儀著，《續修臺灣府志》（臺文叢一二一種，民國五十一年）。
18.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文叢一七二種，民國五十二年）。
19. 陳夢林，《諸羅縣志》（臺文叢一四一種，民國五十一年）。
2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文叢四種，民國四十八年）。
21. 黃逢昶，《臺灣生熟番記事》（臺文叢五十一種，民國四十九年）。
22. 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六十六年）。
23. 鄧傳安，《蠡測彙鈔》（臺文叢九種，民國四十七年）。

二、近人專著

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2. 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
3. 杜正勝，《番社采風圖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八十七年）。
4.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

先住民篇.tpf-44 7/9/2004 11:14:41

5.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6.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一、二、三冊（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九十一年）。
7.陳正詳，《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民國八十二年）。
8.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一七〇〇～一八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七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
9.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六十六年）。
10.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八十年）。
11.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五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
12.黃敦友，〈地理環境〉，見張勝彥主編，《外埔鄉志》（臺中：外埔鄉公所，出版中）。
13.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編，《臺灣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六十八年）。
14.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文獻叢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七年）。
15.劉益昌，《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八年）。

三、期刊論文

1.尹章義，〈臺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臺北文獻》直字59/60（民國七十一年），頁97-252。
2.宋文薰、張光直，〈臺中縣水尾溪畔史前遺址試掘報告〉，《臺大考古人類學刊》3期（民國四十三年），頁26-38。
3.李壬癸，〈發刊辭〉，《平埔研究通訊》1期（民國八十三年），頁2。
4.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卷3期（民國八十一年），頁202-204。
5.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研究》4卷1期（民國八十八年），頁49-96。
6.洪麗完，〈異族接觸與南島民族之「文明化」：十八世紀後半葉岸裡社群社會文化之探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7.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5.初考〉，《臺灣風物》42卷2期（民國八十一年），頁145-188。
8.張光直，〈圓山發掘對臺灣史前研究之貢獻〉，《大陸雜誌》9卷2期（民國四十三年），頁36-41。
9.張光直，〈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卷1期（民國五十九年），頁143-178。
10.莊吉發，〈故宮博物院現藏臺灣開闢檔案簡介〉（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辦「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座談會」，民國七十四年），頁18。
11.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見黃富三、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股

先住民篇.tpf-45 7/9/2004 11:14:41

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九年），頁29-38。
12.程式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1766~1786）〉（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
13.程式毅，〈清代臺中沿山地區族群關係初探—巴宰族群與泰雅族〉（中臺灣鄉土文化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十五），頁1-26。
14.黃增泉、臧振華，〈臺灣之古生態研究（6）臺灣中部十八張、大邱園、牛罵頭、草鞋墩等史前遺址的孢粉分析〉，《臺大考古人類學刊》39/40期（民國六十一年），頁91-115。
15.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上）、（下）〉，《臺灣文獻》29卷2期（民國六十五年），頁111-130；29卷3期（民國六十五年），頁59-89。
16.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之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民八十五年），頁1-26。

貳、日文（含中譯）

一、近人專著

1.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冊，（東京：刀江書店）。
2.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古亭書室）。

二、期刊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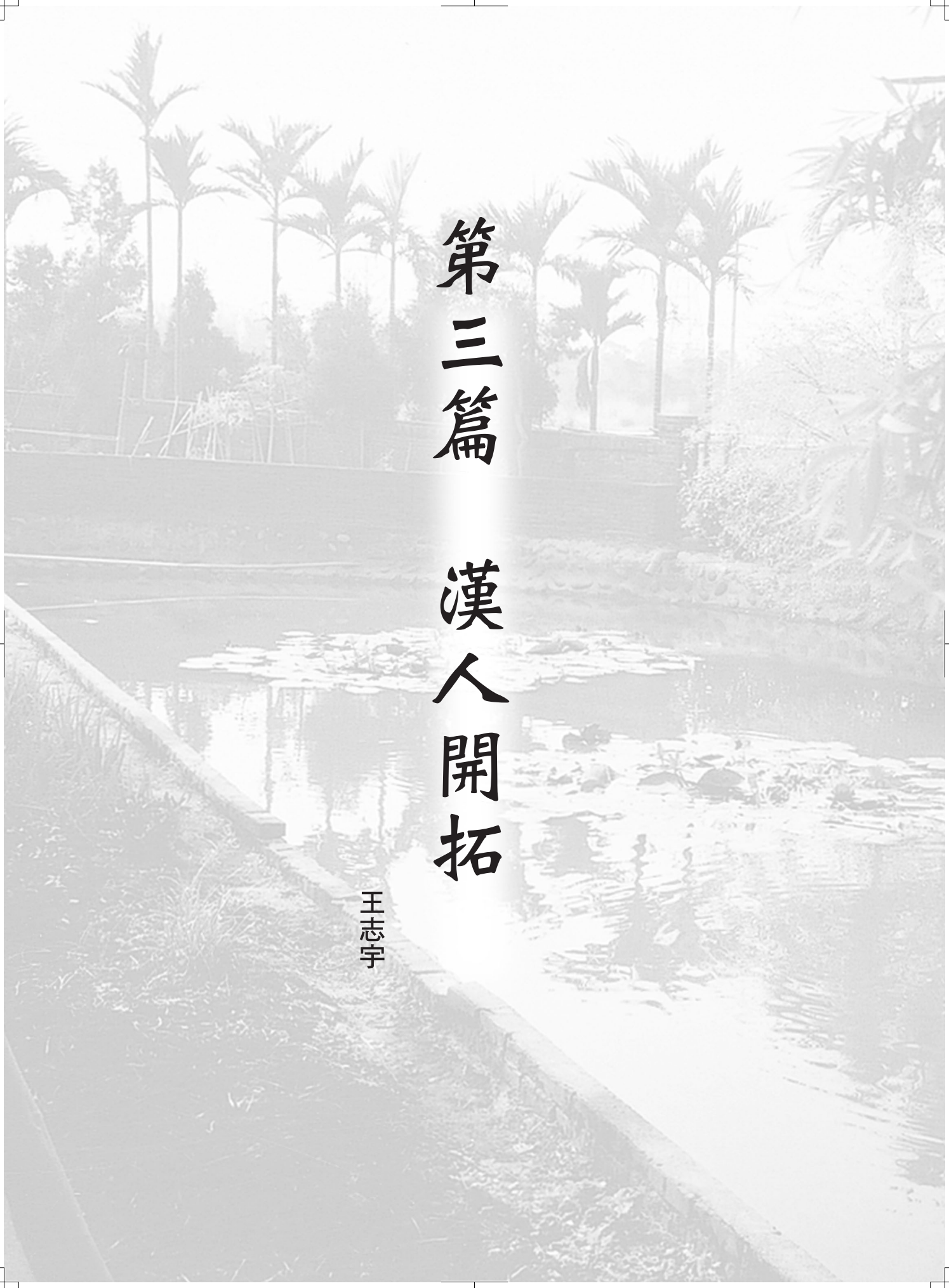
1.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蘭時代的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卷1期（民國八十三年），頁89-103。
2.伊能嘉矩，〈臺灣二於「ペイボ」族ノ概察〉，《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期（明治三十二年）頁304。
3.宮本沿人，〈臺灣新竹州新港熟社番部落〉，《民族學研究》14卷2期（民國三十九年），（見宋文薰譯，〈苗栗新港的平埔部落〉，胡家瑜主編，《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臺北：臺大人類學系，民國八十八年），頁214-217。
4.筧朴郎，〈彰化辦務署管內移住民調查書〉，《臺灣慣習記事》1卷（下）7期（明治三十六年），頁8-10。
5.臺中縣調查，〈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臺灣慣習記事》2卷2期（明治三十五年），頁75-78。

參、英文

1. Peter Bellwood,"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Scientific American*（1991）,pp.88-93.

先住民篇.tpf-46 7/9/2004 11:14:41

扉頁.tpf-2 5/4/2004 21:56:42



第三篇 漢人開拓

王志宇

漢人開拓.tpf-1 7/9/2004 11:14:57

外埔鄉位居臺中縣西北部的后里臺地上，氣候屬於大甲平原區類型。早期屬於平埔族大甲東社的活動地，荷西時期，本鄉仍未有漢人前來開墾，明末雖有劉國軒鎮守彰化，遣軍屯田於大甲一帶，但漢人入墾要到康熙末葉，閩籍林、張二姓墾戶，客籍邱姓墾戶等率佃墾成大安、三十甲、九張犁、日南、鐵砧山腳等莊，本鄉才開始進入開發。漢人入墾後，與大甲東社人產生租佃關係，向其繳租，而隨漢人之勢盛漸有土地買賣情況發生。在漢人進入之後，本鄉水利設施逐漸擴展，其水源主要以雨水、泉水及井水為主，除業主獨資興修的水圳之外，清代與本鄉相關的水利設施有虎頭大圳、九張犁圳、北圳等，而在本鄉灌溉面積最大的后里圳，其開鑿則要到日治時期開始。

第十章 早期之外埔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社會背景

壹、自然環境

一、位置

本鄉位在臺中縣西北部，約在 25° 06′— 121° 20′，北以大安溪與苗栗縣苑裡鎮為界，南以大甲溪、西以鐵砧山與大甲鎮為鄰，東則以后里臺地與后里鄉交接，面積 42.41 公里。（註一）

二、地質、地形與土壤

本鄉位於后里臺地之西，南臨大甲溪，北抵大安溪，受兩溪水之合流沖刷影響，形成本鄉地形特質。清初對臺灣的統治僅及前山地帶，故文獻敘述以此為主。周鍾瑄《諸羅縣志》對本鄉及鄰近地區地形及河流曾有過描述，其言：

> ……大武郡以北，廣漠平沙，孤峰秀出者，曰察望山；其下有北路中軍之旂鼓焉，則半線（莊名）之營壘也（山北為貓羅社）……逾大肚溪與察望相對峙者，曰大肚山（山後為貓霧揀社）。北而沙轆山、牛罵山、崩山（土多崩陷，故名）、鐵砧山（頂圓而平，故名）、宛裏山（沙轆以下五山，皆大路所必經），其小焉者也。……東北為南日山（在鐵砧之東北）、貓盂山（在貓盂社之東）。宛裏以北，路漸迫於海，山峰磊落于海之濱者，曰倒旗山（山形似旗，在吞霄社西）、礁荖吼山（在後壟社前水口）。（註二）
>
> ……大肚之北，曰大甲溪（溪面甚闊，險於大肚。詳見「兵防」），發源於岸裏內山。過樸仔籬山，南分於牛罵，曰牛罵溪；西入於海。曰崩山港（港口多石，商船到此載脂麻），分自大甲溪。西北過崩山，又西為港，入於海。曰大安港（險如大甲，而溪面較狹。夏秋水漲，必俟水落，邊海而行），發源於水沙連內山。（註三）

大致而言，本鄉地形分由后里臺地區及大甲扇狀平原區所構

註一：陳正祥，《臺灣地名手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八年），頁111；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頁164。

註二：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十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文叢，民國五十年），卷一封域志，頁9。

註三：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13。

漢人開拓.tpf-2 7/9/2004 11:14:57

成。后里臺地區位於大安、大甲二溪下游段之間，其東大約越過縱貫鐵路山線，抵珍重山麓，其西至海線鐵路附近。東西長約十五公里，南北寬約五公里，呈矩形狀。臺地高度在東緣山麓地域為三百公尺上下，向西緩斜，至大甲海岸平原時，降至一二〇公尺上下。后里臺地面因地盤隆起與大安溪為主的河川切割，劃分成十二個臺地面，分屬墩仔腳隆起古沖積扇面及磁磘隆起古沖積扇面二大類。臺地面高度從七十公尺到三五〇公尺不等，地勢大約東高西低，南高北地，各作東西伸展。本鄉之地形主要由後者所構成，磁磘隆起古沖積扇毗鄰墩仔腳隆起沖積扇舊面之西北方臺地地形面乃大安溪所形成之複成沖積扇面，地勢向西方或西南方傾斜且分成新舊五段地形面。大甲扇狀平原區在大安溪與大甲溪最下游部份，為大安、大甲二溪河流沖積扇平原。本鄉佔有臨二溪扇端所開展出來的夾窄帶狀扇面之一部分。（註四）

地質上本鄉所從屬的后里臺地，屬於第四紀地層的洪積層，其主體為大小各種岩石塊與礫岩，一般而言，其上覆蓋赭土，其中並未含有化石。而大甲扇狀平原在地質上屬沖積層，以礫、砂及黏土為主體。（註五）依土壤之質地區分，主要有紅棕壤和沖積土。紅棕壤大部分化育於五百公尺以下之洪積臺地，有機物分解快，易流失，土壤深厚，含有卵石、礫石，呈紅棕色，為其主要特徵，為農業重要土壤。主要作物為水稻與甘蔗、甘藷、樹藷等。沖積土分佈在沖積扇、河流邊緣、低位河階地等，本區之沖積土質地以中質地的壤土佔大部分，生產力大約在中等或以上，作物的限制不嚴，可作為農業發展之區。（註六）

三、氣候

氣候影響農業最為明顯，依據地勢與雨型，可將臺灣分成中部山區、北部丘陵區、西部平原區、東南丘陵區等四個地理區，本鄉屬於西部平原區中的大甲平原部分。就地勢而言，最主要為一百公尺與五百公尺兩條等高線，其中一百公尺的等高線，大體已能顯現出臺灣所有的平原與盆地。而就雨型而言最可注意的一條分界線，應為夏期雨量佔年雨量 80%的等量線，存在於北部丘陵與西部平原的交接處，亦即約在通霄與東勢二地之間。此外有兩條比較次要的氣候分界，一為西部最冷月平均攝氏十六度的等溫線，一為一月份平均日照率 50%的等日照線，也大致與上述下雨佔年雨量 80%的等量線符合。依此區分，本鄉氣候屬於大甲平原區，作物以水稻、小麥、甘藷、蔬菜、甘蔗為主。（註七）

由上所述可知本鄉自然環境的條件，也由於此氣候、地形、土壤、水文等條件相當優越，本鄉氣候乃得以發展出以稻米、甘蔗為主的米糖產業。

四、交通

本鄉交通受河流及地形的限制，對外聯絡以東西向為主。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鹿港巡檢署移至大甲，因大甲為當時臺

註四：參見張勝彥主編，《臺中縣志》（豐原：臺中縣政府，民國七十八年），卷一土地志，頁 85-90、頁 97-100。

註五：參見張勝彥主編，《臺中縣志》，卷一土地志，頁 108-109；有關臺灣的地質構造另可參閱林朝棨等編著，《臺灣地質》（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六十三年），第二章臺灣的地層部分。

註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臺中縣大甲溪流域開發史》（豐原：編者，民國七十八年），頁 166-167。

註七：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民國八十二年，民國四十八年一版），頁 768、頁 819-820。

漢人開拓.tpf-3 7/9/2004 11:14:57

灣南北縱貫交通大道的重要據點，首先形成一條從西南向東北的大甲街或簡稱大街，交通四通八達，往西北通發展出向大安港的西門街，往東通本鄉及后里的東門義路。（註八）是以本鄉在嘉慶年間往西已有通往大甲的大路出現，往東也能通往后里。事實上，本鄉南北分別以大甲溪與大安溪與其他鄉鎮區隔，自古以來其對外聯絡就仰賴此一東西向道路。目前本鄉對外聯絡道路還是以一三二縣道為主要聯絡幹道，東通后里，西通大甲，往南受阻於大甲溪，需繞道至大甲，改行臺一線，才得以至清水鎮；往北欲往苗栗縣，亦需繞經大甲或后里。此其交通概況。

貳、社會背景

本鄉在漢人未移住之前，為平埔族大甲東社的活動地，少部份為大甲西社生活領域；二者均為清代文獻所說的崩山（又名蓬山）八社社群成員。平埔族群的經濟生活以狩獵為主，兼有簡單的農業生產及捕魚活動。因其以狩獵生活為主，故荷治時期荷蘭人乃創立賫社制度，由漢人與平埔族群進行鹿皮交易，而此賫社制度至清代之時仍然有效運作，平埔族人亦透過此制度，漸與外界有所接觸。然而由於平埔族人的經濟活動以狩獵為主，故農業技術不發達，農業生產力低落如同古文獻所記載：「種禾於園，種之法，先於秋八、九月誅草，平覆其埔，使草不沾露，自枯而朽，土鬆且肥，俟明歲三、四月而播，場功畢，仍荒其地；隔年再種，法如之。」（註九）其農業生產技術如此簡單，故其糧食亦以稻粟黍為主，如《裨海記遊》所記：「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註十）惟平埔族之種植稻米乃近期之事，大致而言，臺灣南部與外人接觸較早之土著多種植稻米，北部諸平埔族在清初尚以小米為主要穀類，中部諸平埔族則稻米與小米並重。（註十一）然而受到平埔族此種自足式經濟與不同於漢民族的地權、儲蓄等觀念的限制，在漢人進入此地以後，土著在與漢人競爭上居於劣勢而敗退下來，或被同化，或移居他處。（註十二）面對漢人的生存競爭，平埔族人漸居劣勢，在漢「番」的相處上，不免受到漢人的欺凌；因受此壓迫而反抗者，不乏其例。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十二月，蓬山八社之一的大甲西社林武力學生者，受激於漢人的恣行侵佔峻削而串連鄰近的平埔族樸仔離（在今臺中縣新社、東勢等鄉鎮境）等八社反動。翌年更結合沙轆社（在今臺中縣沙鹿鎮境）、吞霄社（在今苗栗縣通霄鎮境）等十餘社，圍攻彰化縣治。焚殺慘烈，百姓奔逃。後來由王郡與巡臺御史覺羅柏修率兵平亂，渡大甲溪，進剿逆番，而亂得以平。當時居於本鄉的大甲東社不與亂，故免被懲處，大甲社名遂專冠於東社。（註十三）然而此一事端僅為漢「番」衝突中的問題之一，漢人與原住民的相處，大多建立在「利」字之上，漢人或取其力役輸賦，或為鹿皮貿易而與其交往，因此原住民的處境不問可知。如郁永河所言：

註八：張勝彥主編，《臺中縣志》，卷一土地志，頁32。

註九：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頁165。

註十：郁永河，《裨海紀遊》（臺文叢第四十四種，民國四十八年），頁35。

註十一：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大陸雜誌》，10卷9期（民國八十四年），頁288。

註十二：有關本地平埔族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參見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卷3期（民國八十一年），頁175-176。

註十三：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年），頁413-415。

漢人開拓.tpf-4 7/9/2004 11:14:57

> 自紅毛始踞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襲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為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朘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註十四）

在漢「番」相處的過程中，漢人為防番人早已設立了兵屯。相關史料記載，明永曆二十三年（一六六九）右武衛劉國軒鎮守彰化，曾遣軍屯田於大甲一帶，以制崩山八社平埔族人。明鄭時期，大甲附近已有來自晉江的漢人李殖春入墾。不過漢人在大甲一帶的活動，從史料上看來，到了清初時期，仍相當有限。《臺灣府志》記載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煙瘴愈厲，人民鮮至。」（註十五）郁永河《裨海紀遊》載：「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雙寮社，至苑裡社宿。自渡溪後，御車番人貌易陋，變胸背雕青為豹文。無男女，悉剪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註十六）至康熙四〇至五〇年代，由南部往北墾殖的移民，已到大甲一帶。《諸羅縣志》載：「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自四十九年洋盜陳明隆……此後流移日多，乃至日南（今大甲鎮日南、幸福二里）、後壟、南崁所在而有。」（註十七）從族譜資料可知，在康熙末葉，閩南籍林、張二姓墾戶，客籍邱姓墾戶，率佃戶墾成大安、三十甲、九張犁、日南、鐵砧山腳等莊之荒埔以及東方之土城，然而因為臺地地形缺乏水利，未及全面化。大致而言，此地移民乃沿大安溪南岸，與鐵砧山北路間之狹窄通道向東伸展。移民從大安港登陸，出墾於鐵砧山、崩山之西的大甲清水海岸平原，而後溯大安、大甲及水尾溪，抵達本鄉拓墾。另一方面也有從豐原、后里地方北上的漢人與巴宰平埔族入墾。清代中葉以後，大批客籍移民，從苗栗地區渡大安溪南下，入墾本鄉。（註十八）目前本鄉居民以漢人為主，閩南籍約佔70%，粵籍約佔30%，其中六分、廣仔粵籍人數較多。（註十九）大致由於上述本鄉地形及河流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必須溯溪進入本鄉，或者由后里地區向西進入本鄉，形成過去移民進入外埔的兩大路線。

本鄉過去為大甲東社的住居地，在漢人進入開發以後，漢番相處的種種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就清代的統治而言，漢人為開拓土地，侵入平埔族社的住居地以後，雙方的接觸增加，以及漢人對原住民的欺壓、漢人本身不同祖籍人群的衝突，使得動亂頻

註十四：郁永河，《裨海紀遊》，頁36。

註十五：高拱乾，《臺灣府志》（臺文叢第六十五種，民國四十九年），卷七風土志氣候，頁190。

註十六：郁永河，《裨海紀遊》，頁20-21。

註十七：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頁110。

註十八：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164。

註十九：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164。

漢人開拓.tpf-5 7/9/2004 11:14:57

生，為了增加戍守的兵力，穩定這些地區的秩序，官方乃有利用「熟番」力量防禦地方，設立「番屯」的建議。《淡水廳志》所謂：「按稱社者，番居也；稱堡者，民居也。歷年番社半歸漢業，閒多雜處；且叢山窩遠，生熟各番界在疑似，譯名互異，為社亦多。今就同治九年屯丁冊，查南北熟番凡四屯，均由屯外委選充，隨時會同鹿港廳操演……淡南日北社屯管下大小五社，屯丁三百名：大甲東社屯丁七十二名……」（註二十）亦就是在番屯制度下，本鄉過去設有屯丁七十二名。

第二節　荷西及鄭氏時期之外埔

十五世紀末，貿易新航路與新大陸的發現，開啟世界歷史的新紀元。西人東來與中國被拉入此一貿易網路之中，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葡萄牙人於此時先與東方接觸，西班牙人繼之而來，此後葡萄牙人據澳門，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和中國展開貿易。此後在東亞地區的貿易越見繁榮，大批商船往來日本、中國和菲律賓之間。

一六〇一年（明萬曆二十九年），荷人兩船抵澳門沿岸，要求與中國通商。當時葡人據澳，力阻其事。一六〇三年，東印度公司派船（韋麻郎 Waerwijk 率）進攻澳門失敗。荷人在大泥結識華商李錦，李建議占澎湖；一六〇四年八月荷人佔據澎湖。荷人據澎後，福建當局急於將之驅走，利用商人李錦、詹獻忠往諭，皆無效。而荷人也利用華商林玉等向福建稅監高采行賄，意圖通商。高乃運動大將軍朱文達意圖通融，而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力主驅之，後派總兵施德政與金門把總沈有容負責。沈有容帶林玉往見韋氏，迫其遷離，荷人最後於十二月遷走。一六一九年荷英簽署攻守同盟後，荷西關係緊張。荷蘭在獲知西班牙有攻臺之企圖後，一六二二年六月搶先攻澳門，失敗後轉往澎湖，七月至大員附近觀察地形。荷人求通商不遂，轉以武力騷擾。一六二二年（明天啟二年），中國負責之巡撫為商周祚，一六二三年南居益上任。南居益誘荷人弗朗斯至廈門擒之，荷人勢衰，至二四年八月由海盜李旦斡旋，副將俞咨皐與荷人定約，荷人毀城撤往臺灣。荷人據臺為福建當局私下之協議，並無向上報告。

總之，臺灣之為荷人佔據，是在中國政府與海盜、洋人三者間的矛盾與衝突下的結果。一方面是李旦等海上武裝集團的活動希望拉攏明朝官吏，但又為了自身的利益，積極活動讓荷蘭人在臺灣落腳，以就近與之貿易。另一方面，荷蘭人本就想要佔領中國沿海為通商據點，而明政府的內部矛盾重重，國力極其虛弱，地方當局對以武力驅逐荷人的信心不足。（註三）

荷人來到東亞所想要的是中國的絲綢、砂糖以及瓷器等貨物。在佔領臺灣之後，為確保臺灣作為轉接港口的地位，積極進行統治。約在一六三五年（明崇禎八年）以後，當福建沿海恢復平靜，荷蘭人和日本的矛盾也和解了，在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勢力中衰，荷蘭人開始集中兵力討伐大員附近的村社。在一六三五—一六三六年，討伐麻豆等社並向南部擴張；一六四一—一六四二年，討伐中部法沃蘭人，東部大巴六九人以及出兵攻佔雞籠；一六四四—一六

註二十：陳培桂，《淡水廳志》（臺文叢第一七二種，民國五十二年），建置志，頁83。

註三：有關荷蘭人入據臺灣，參見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29-37。

漢人開拓.tpf-6 7/9/2004 11:14:57

四五年，反覆掃蕩北部、中部和東部，奠定荷蘭人在臺灣的勢力範圍。荷蘭人為加強對原住民的統治，建立了地方會議制度，以牧師籠絡和控制原住民長老。此外也建立了納貢制度，向原住民徵稅，並削弱部落領袖的勢力，限制原住民與漢人交往等。對漢人的統治則利用漢人有力人物，稱為長老或稱僑長；以他們在漢人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對他們勢力所及的漢族移民進行管理。（註三）大致而言，在荷蘭人統治下的原住民從一六四七年的一三、六一九人到一六五六年已增加到三一、二二一人。（註三）

荷蘭的統治，政治與經濟是並行的，除了鞏固其統治外，在漁業方面，烏魚的捕捉在當時是重要的漁業項目之一。荷蘭人對到臺灣沿岸捕魚的中國人徵收漁業稅，在荷人的保護與管制之下有許多季節性的漁夫自中國大陸來臺灣捕魚，也有許多移民搭乘漁船來臺灣定居。另外在貿易的需求下，臺灣所生產的鹿皮成為重要商品，許多漢人來臺從事漢「番」交易，將鹿脯運回大陸，鹿皮運往日本。因此，鹿皮貿易也成為荷蘭人據臺之後的重要商品，荷蘭人為了貿易的需要也為了遏止漢人介入土著反抗荷蘭人的行為，創設了以招標包辦「番社」交易的所謂「賧社」制度。為了貿易，荷蘭人也招徠漢人入墾，使稻米和糖成為臺灣兩大農產品。在一六三八年（明崇禎十一年），臺灣的荷蘭人支配區內約有一萬至一萬一千名的漢人。在一六四〇年（明崇禎十三年），蔗糖產量達四、五千擔，到一六四五年蔗糖產量已達一萬五千擔。從土地開墾上言，一六五五年（明永曆九年），在赤崁附近開墾的土地，稻田達五、五七七．七摩爾亨，蔗園達一、五一六摩爾亨。（註四）

在荷蘭人的統治下，臺灣的土地開闢有了初步的成效，然而其開發仍以大員為中心，不過在傳教方面，其傳教士的活動範圍已到彰化的鹿港、二林地區附近，（註五）其活動勢力已達彰化地區，然而此時的外埔一地，仍屬草萊未闢地帶，僅有原住民活動於其間。

大致而言，荷蘭人為了以臺灣作為其對大陸和對日本的轉接港口，在臺灣的統治相當積極，在開墾方面，已獲有相當成就。是以何斌於游說鄭成功攻臺時，言臺灣「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數日到臺灣，糧食不竭。」（註六）鄭成功以荷蘭人在臺的統治實力並不堅強，進圖臺灣。而鄭軍有著糧食缺乏的問題，所以到臺灣以後，便積極展開墾殖措施，以解決糧食缺乏的問題。鄭氏入臺後不久，雖因病去世，然而繼位者鄭經，任用陳永華，勵精圖治。首先是對原住民大加安撫，「課耕種，安撫土番，貿易外國，通魚鹽，向之憚行者，今皆為樂土焉。」（註七）而為供應大軍的糧食，鄭軍在入臺之後，便讓各營鎮赴汛地墾殖，「左先鋒札北路；新港仔、竹塹，以援剿後鎮、後衝鎮、智武鎮、英兵鎮、虎衛右鎮，繼札屯墾；以中衝、義武、左衝、

註三：有關荷蘭人對漢人和原住民的統治，參見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頁72-101。

註三：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卷2期（民國七十九年），頁94-95。

註四：有關荷人在臺灣的開發，參見曹永和，〈荷據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民國六十八年），頁45-70。

註五：有關荷據時期的傳教狀況，可參見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一年），頁563-567；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頁101-114。

註六：楊英，《從征實錄》（臺文叢第三十二種，民國四十七年），頁148-149。

漢人開拓.tpf-7 7/9/2004 11:14:57

前衝、遊兵等鎮札南路鳳山、觀音山屯墾。頒發文武官，炤原給額各六個月奉役銀，付之開墾。」（註二六）隨著鄭氏政權、官民的開墾，也逐漸形成明鄭時期的土地制度。荷蘭的王田為官田，耕田的人成為官佃，租稅一如其舊，此為官佃田園。鄭氏宗黨藉文武官民等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即為私田，也就是文武官田。其餘鎮營兵丁，就其駐紮地區，自耕自給，此為營盤田。在明鄭的招徠之下，僅在鄭經時代，大陸的移民數約在十五到二十萬之間。而在此時明鄭的開墾也有明顯的成果。《臺灣外記》云：「（永曆二十年）……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註二七）而其墾殖範圍，誠如伊能嘉矩所言：當時其拓殖地區，除有承天之一府、安平之一鎮外，以附近南北所發展之文賢、仁和、永寧、新昌、仁德、依仁、崇德、長治、維新、嘉祥、仁壽、武定、廣儲、保大、新豐、歸仁、長興、永康、永豐、新化、永定、善化、感化、開化等二十四里為中心，漸次擴及以外之地方，即南是鳳山、恆春，北是嘉義、雲林、彰化、埔裏社、苗栗、新竹、淡水、基隆等之各縣，並及廳下之一部份（尚有北路之基隆、南路之恆春等之某地方係屬極邊煙瘴區，擬充為罪人流謫之地）。（註二八）

大致而言，鄭氏的開墾區域，是南至恆春，北及基隆淡水，其重心雖依然是承荷蘭人之餘緒，以現在的臺南為中心，然而在水利的開發及作物的引入上，皆有相當貢獻。其開墾區域雖不見擴大，但其點狀分佈已及於臺灣全境。（註三）此時雖有漢人已到大甲附近，但外埔一地尚未有漢人入墾的相關記載，仍是平埔族大甲東社人與大甲西社人的居住地。

註二六：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文叢第二十四種，民國四十七年），卷二。

註二七：楊英，《從征實錄》，頁154。

註二八：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世界，民國四十八年），卷十三。

註二九：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頁132。

註三：有關鄭氏在臺灣的開發及墾殖，詳見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55-293。

漢人開拓.tpf-8 7/9/2004 11:14:57

第十一章 清代之開發

第一節 漢人移民

有關本鄉漢人的開拓，記載得較為直接與清楚者為伊能嘉矩所編《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苗栗三堡條：「屬於過去的舊大甲堡，清代光緒元年稱為竹南四堡，光緒十四年改稱苗栗三堡，為以大甲街為主，居於大安、大甲二溪流域間的區域。大甲附近於明鄭時已經駐兵屯墾，為該地最早開發地區。清康熙四十年左右，由鹿港地方北進的漢人，以及由大安港上陸的漢人，開始進行拓墾。當時閩人林、張二姓以及來自廣東的邱姓，率領眾佃開拓今大安庄、三十甲庄、九張犁庄、日南庄、鐵砧山腳庄等荒埔。康熙四十五年在現在大甲街所在，建立閩粵雜居的小街肆。當時也在拓植區到東方土城庄間修築土城，以防番害。」（註一）

大致而言，原大甲東社在此地活動時已有農業，即在目前的大東村，因為處於湖底位置，早期水源充足（有泉水），不需要再利用陂水或圳水，故先開發。（註二）漢人前來開發建立了鐵砧山腳庄以及土城庄，隨後也逐次建立了磁磘（今外埔鄉大同、三崁二村）、六分（今外埔鄉六分、永豐二村）、內水尾（今外埔鄉水美村）、馬鳴埔（今外埔鄉馬鳴、中山二村）等地聚落。（註三）

本鄉在漢人未移入之前主要為平埔族大甲東社的活動地，漢人進入本鄉開發，從上所述，可溯至康熙四十年左右。清代時期漢人陸續移入，此時雖沒有可靠的漢人人口統計數字，但降至日治時期，日人在臺進行了許多調查，有相當的資料可供參考。據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於昭和元年（一九二六）調查之《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外埔庄漢人的籍貫比為同安佔32.8%，三邑20.5%，潮、嘉、惠佔38.7%，安溪佔2.7%，漳州佔2.7%，汀州佔2.7%。（註四）此數字或許可稍微瞭解本鄉的人口組成關係。從上列數據上看來，本鄉實以閩南人與客家人為主。康熙末年，閩南人與客家人相繼進入本鄉發展，不過客家人因受到閩南人的排擠，紛紛移往東勢、石岡、新社等鄰近地區，但是到了清末，又有一些苗栗、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南遷，進入大安溪南岸，闢建家園。本鄉曾領導臺灣義軍對抗日軍的劉定山，就是在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先到三崁村來開發河埔地，又興建了后里水圳，確定可耕居之後，在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將整個家族從苗栗搬來。（註五）

民國七〇年代本鄉居民以漢人為主，閩南籍約佔70%，粵籍約佔30%，其中六分、廍仔客籍人數較多。（註六）大致而言，本鄉為閩粵混居的社會，不過閩南人仍佔多數，勢力較為龐大。

註一：伊能嘉矩編，《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明治四十二年），頁62。

註二：〈外埔鄉志第二次耆老座談會議記錄〉，頁3

註三：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頁164。

註四：洪麗完，〈大安、大肚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頁179。

註五：劉還月，《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民國八十九年），頁239-240。

註六：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頁164。

漢人開拓.tpf-9 7/9/2004 11:14:57

由於本鄉移民大多來自閩粵地區，清代社會閩粵間的衝突，也在本鄉出現。清代的閩粵族群衝突乃在移民漸多，可墾地開發殆盡，而此時不同籍貫不同的習俗和宗教信仰，在「群體意識」高張下，形成若干矛盾，加上利害衝突，同籍人互相援引，昇高了彼此的對立，導致閩粵、漳泉等互鬥。潮洲系的劉和林子孫三代開發新莊平原，以強力手段，率眾壅水築圳，分享泉州系張厝圳的水源，開鑿了「劉厝圳」，可說是族群間在群體意識形成後，互爭水源利益，導致對立昇高的代表，而後的分類械鬥終使粵人潮洲移民離開了臺北平原。（註七）事實上分類械鬥常引起人民遷徙，尤以敵對兩籍村落分布的交界處為然，此外，漢人村落的組成，也以祖籍為原則，也因此造成族群械鬥時，會迅速慢延至其他地區，甚至震動全臺。臺中地區許多地方原是閩粵合力開發之處，在族群勢力及意識形成之後，（註八）產生多次的分類械鬥，在經過乾隆五十一年因林爽文事件所引起的閩粵械鬥與道光和咸豐年間的械鬥後，漳、泉、粵籍居民在此一地區的分布涇渭分明，粵籍集中在葫蘆墩（今豐原）、石岡仔（今石岡鄉）、東勢角（今東勢鎮）一帶，漳人佔據大雅、潭仔墘（今潭子鄉）、內埔（今后里鄉）附近；泉人則集中在牛罵頭（今清水）、神岡附近。（註九）

本鄉閩粵漢人間的衝突，主要還是為了灌溉的問題，水路上下游間的閩粵農人，遇到水路上游農人引水入田，下游的農田就沒得灌溉，閩粵人間的衝突也由此引發。此外，閩粵通婚，如閩南男子和粵家女子結婚，也會引起嚴重的爭執。（註十）

第二節　土地拓墾過程

明末清初漢人入墾臺灣，耕地日拓，隨著漢人的開發腳步，逐漸發展出租佃制度來，也就是所謂的大小租制。有關臺灣開墾過程中，開墾者的種種身份區別，在清代的文獻中皆略有提及。《諸羅縣志》：「……田園之主，其名有四：曰官莊，則設縣之後，郡屬文武各官招墾田園，因而遞受於後官者也。曰業戶，則紳衿士民自墾納賦或承買收租，而賦於官者也。曰管事，則鄉推一人理賦稅、差役，官就而責成之眾，計田園以酌其值，而租賦不與焉者也。曰番社，則番自為耕，無租賦而別有丁身之餉者也。」（註十一）此清初地主身份之四類，而隨著臺灣土地拓墾之進展，逐漸發展出複雜的墾佃關係。《淡水廳志》記載：「……內地惟正之供，就田徵賦，悉由田主交納，包糧者有禁；而淡水田主所收者謂之小租，官所徵者謂之大租，大租概由業戶徵收轉以納官，所收浮於所納，每田各帶大租若干。業戶自有契據，可

註七：尹章義，〈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開發臺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見著者，《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民國七十八年），頁349-380。

註八：如清水平原的開發，閩粵人士皆有所貢獻，然而在械鬥之後，粵人離開，使粵人所建立的三山國王廟之香火有所變化，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北：編者，民國七十七年），頁13385。

註九：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師大地理學系，民國七十六年），頁70，82-83。

註十：〈外埔鄉志第二次耆老座談會議記錄〉，頁2-3。

註十一：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六賦役志，頁86。

漢人開拓.tpf-10 7/9/2004 11:14:57

以典賣。」（註十二）此類業主、大租、小租等，涉及清政府對土地的管理，也牽連民間開墾土地的發展歷程與型態，其間關係複雜。

清代對土地的管理，可溯及明鄭之時，鄭氏時代的文武官田，在清朝領臺之後改為民業，按其等則，徵收租額。另外清政府頒佈墾荒令，部分豪族向官府請墾開發，召集墾民，相約墾成以後，當地的管業權移歸力墾者，同時由力墾者永久繳納一定租額，以為代償，形成墾佃關係。墾佃關係成立以後，墾佃財富有所推移，部分墾戶財產日增，亦有沒落者，而出賣租權漸與土地失去直接的關係，結果租權逐漸分散，莫知所終。反之，當初的佃戶，因每年農業之利，有些成了大富戶，且對土地有了直接的關係，其勢力駕乎過去的墾戶之上，掌握了土地的實權，此時的佃戶已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可算是地主，他們可以自由處分其所支配的土地，轉租於佃人，使事耕種。此時從事耕種的人，稱為現耕佃人。佃戶每年由現耕佃人徵收一定的租穀，與墾戶每年由佃戶徵收一定的租穀，這兩種收租權，發生在同一土地之上，墾戶的收租名為大租，佃戶的收租，名為小租，產生了大租戶、小租戶與現耕佃人三等階級，長期支配了臺灣的田制。大租的租額與土地肥瘠、水利有無有關，但無一定的標準，大體為其收穫的十分之一；小租通常為其收穫額的十分之四左右，而每甲的租額約三十至三十五石，完全由小租戶與佃人協定，不像大租有等則。（註十三）此種土地租制之形成有二個基本因素，一是受大陸本土舊習慣一田二主制，甚或一田三主制的影響；第二是清代的墾例，為鼓勵墾荒，對申請者發給墾照，給予土地業主權，可自耕，也可招民耕作。然而不肖之徒設法取得廣大土地之後，招民代耕，坐享其成，墾佃關係因此而起。且清初漢人在臺灣南北取得耕地的方式並不完全相同，在南部是向政府申請，取得墾照，在北部是與土著妥協，付出相當代價，換取埔地。而北部曠地極大，某些佃戶自行耕種之外，大多再轉租，而形成前述租制。（註十四）

大致而言，在理想型態上，土地開發過程應該是墾戶、墾首向官報墾，田園墾成後（通常三年），墾戶、墾首向官方報陞納賦，稱為陞科。墾戶完成陞科後，官方將其登錄於租稅簿冊上，稱其為業戶、業主。也就是說，在理想型態上，請墾者名稱的發展應是墾戶、墾首轉成業主再轉成大租戶。相對的被墾戶所招募的佃戶，在日後地位上昇之後的轉化，應是佃戶轉成田主，再轉成小租戶。不過在實際的發展上，由於投資失敗、天災、商品經濟的發展、大租戶土地圵分、後代耽於逸樂等等因素，使得墾戶跟業主不見得為原來的經營者。（註十五）

本鄉在漢人入墾之後，「番」漢之間形成微妙的互動關係。一般說來，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是採用隔絕保護的方法，然而清政府對臺灣消極的統治態度，以及官員對原住民語言文化的陌生，原住民接受統治之時，對官府的文書禮節，同樣一無所知，所以衍生出一批負責溝通的中間人來。這批人可分為三類：

註十二：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頁88。

註十三：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帕米爾，民國七十四年），頁41-43。

註十四：參見黃富三，〈清代臺灣的土地問題〉《食貨月刊》4卷3期（民國六十三年），頁81-82

註十五：有關業戶、墾戶、大租戶、小租戶間的關係，參見黃富三、翁佳音，〈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見《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頁117-152。

漢人開拓.tpf-11 7/9/2004 11:14:57

一是社商；一是土官；一是通事；三者之間來源有異，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亦不同。社商源於賧社制度，商人向荷蘭人承包取得權利，壟斷所認部落的貿易權，此制後來為明鄭及清政府所沿用。土官是由社民從社內的耆老、頭人中，推舉出較具有人望的人選，然後具結呈報理番同知；官府認為合適就發下諭帖，公告該社人眾和佃戶，並發給戳記，移知「番社」所在地的廳縣，使土官成為「番社」的法定代理人。通事大多為瞭解「番情」，懂「番語」的漢人，然而隨時間的推移，平埔族人與漢人的接觸更加密切，知曉漢人文書語言的土著更多，逐漸成為通事人選的主要來源。土官與通事關係密切，土官為部落的代表人，通事則是疏通官府和部落意見，充當翻譯的中間人。一般而言，有關收社租、發口糧、派差役、爭執毆傷與社地有關的土地契件的訂定，一定由通事、土目會同查察、蓋印才能生效。不過，通事的意見較土目更具決定性。這批中間人，在臺灣吏治的惡化下受到波及，也使得平埔族人的處境更加困難。（註六）大致而言，漢人取得原住民土地的方法除了強取之外，亦可用交換土地、結婚、同化、騙取土地、偷墾、利用土著習俗、借居或租屋取地、放高利貸與原住民等方式騙取而得。也有以正常的途徑，如以水換地、租業、買賣等方式取得。（註七）清代主要居於本鄉的大甲東社，雖然沒有參加林武力的抗清事件，但是受到漢人欺壓的情況，從林武力事件的調查，以及臺灣各地漢番相處的情況，可以略知一二。而從目前外埔地區所收集的古文書看來，許多大甲東社原住民將土地轉賧給漢人，應不只是單純的不熟悉農作而已，上列所述的許多情節，應該在本鄉也同樣上演。（註八）

在漢人進入本鄉開發土地，與平埔族大甲東社混居之後，原住部落因不熟習農事，以及上列種種情事，而將土地租賧與漢人，並形成「番大租」。所謂「番大租」為由平埔社人手中準用普通大租所徵收之大租，凡在給出社地之時，也仿造漢民，做成一定契字，以資證明。按通例平埔社（人）即屬大租戶，受「番地」給出的漢人，當然屬小租戶，但有時受此「番地」給出者，再將之給出他人，令其開墾，此時第二次再給出漢人將佔普通大租戶的位置，該開墾者將成小租戶，「番大租」當獨立於普通大租戶之上。然而其「番大租」的本質，仍然不變。而當初「番地」給出，被限定於租予的方式，但爾後往往藉租賧之名，而行賣斷之實，至侵佔「番業」。另一方面甚至有假託「番地」，意圖逃避徵賦之情事發生。大致而言，產生「番大租」關係的土地，有屬部落公有及社人私有埔地二種：因此由是所生「番大租」亦有兩類：徵收自公有社地之「番大租」，曰公口糧租，由土官（土目、頭目、董事代表收繳）或遵社例分配於全社，或充為一社之祭儀、會飲部落群體之公費；其自私有「番地」徵收之「番大租」曰，私口糧租，歸該社人私有。（註九）

註六：詹素娟，〈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探討〉，《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199-205。

註七：有關漢人取得原住民土地的方式，可參見黃富三，〈清代臺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月刊》11卷2期（民國七十年），頁72-79；張勝彥，〈清代漢人土地所有型態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報》4期（民國七十年），頁49-76。。

註八：有關平埔族人地權的流失過程，陳秋坤對活動於大安溪及大甲溪中游的平埔族岸裡社有深入的研究。參見氏著，《清代臺灣土著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第七章番產外流和土著貧困化問題。

註九：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頁341-342。

漢人開拓.tpf-12 7/9/2004 11:14:57

本鄉大甲東社平埔族地權流失的狀況，從本鄉的古文書可以查知，茲將與本鄉直接相關的古文書，摭拾部分為例，列之於下，以瞭解本鄉的非漢民族與漢族相處情況，以及土地開發狀況。

地契一：（註二）

立招賣永耕契字人大甲東社番婦阿蕉添，有承祖父遺下水田壹段，坐落土名在番社前大小陸坵，東至麟生田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溝為界，北至蚋蚋老田為界，四至界址明白為界，原帶麟生水尾灌注充足，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此田出賣他人，先問社中土目番親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招與大甲東庄漢人柯祥觀出首承耕。當日三面議定，時值磧地銀柒拾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耕作掌管。歷年配納番大租粟貳斗正，六月給完單完納，不敢少欠，日後子孫不敢言找言贖滋事，保此田係是阿蕉添承祖父物業與番親叔兄弟侄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等情為礙。如有此情是阿蕉添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干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合立招賣永耕契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契字內佛銀柒拾大員正完足再炤

為中生元

代筆林武力六仔

知見（印記）

在場（印記）

道光拾年捌月　日立賣永耕契字人大甲東社番婦阿蕉添

地契二：（註三）

立給壑契永耕字人大甲東社番勝已烏蚋有承祖父遺下厝地基壹所，坐落土名在番社內西勢，東至有父石岸為界，西至林武力厝前路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有父厝地基為界，四至界址，面踏分明為界。今因乏銀應用，托中引就向與番社尾賴阿海聰觀出首承壑耕，時值價一大員正，其銀及日仝中交收足訖，其地基隨即踏明，交付銀主賴阿海聰觀前去管耕。每年配納大租粟貳斗正，不敢少欠，異言生端。倘有上手來歷不明，係是勝已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況此地基與他社番親疏人等無干涉，此係二比干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給壑耕契字壹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仝中親收過壑耕契字內價銀壹大員正足炤

代筆東天枝

知見（印記）為中（印記）

在場（印記）

同治陸年拾月　日立給壑契永耕字人大東社番勝已烏蚋（印記）

地契三：（註三）

立賣耕字大甲東社番婦難仔，有承祖父遺下埔園壹段，在過坑仔，東至余家園為界，西至柯家園為界，南至溝為界，北至坪為界，四至界址面踏分明為界。今因乏銀費用，先問房親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馬鳴埔庄李生旺觀出首承耕。當日三面言議

註二：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臺中：外埔鄉公所，民國九十年），頁148。

註三：引自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44。

註三：引自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54。

漢人開拓.tpf-13 7/9/2004 11:14:57

定，時值賧耕價銀一時陸大員伍角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其園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耕作。歷年配納大租粟壹斗正，六月完納。其園限耕拾年為滿，自光緒元年起，至光緒拾壹年冬址。限滿之日聽其業主被足契面銀送還取贖原字及園，不得刁難，若是至期無銀可清還者，依舊銀主掌管耕作，不得異言爭端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立賧耕契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賧耕契字內佛銀壹拾陸大員伍角正足訖再炤

代筆朱克居

知見（印記）　為中（印記）

在場（印記）

光緒元年拾壹月　日立賧耕字大甲東社番婦難仔（印記）

事實上從本鄉所收集的古文書中，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許多地契資料透露出本鄉土地的開發及利用狀況。如明治三十七年馬鳴埔盧允居將其水田賣與鐵砧山腳庄許其琛的杜賣盡根水田契就提及「……原帶外埔圳水通流灌溉充足，每年納大租粟一斗六升正，今因乏銀別用，愿將此水田出賣盡根……」（註三）

第三節　水資源之開發

臺灣地區雨量多集中於夏季，河川又多湍急，流量不定，水資源的利用便成為農業能否進展的重要因素。臺灣各地水資源的開發雖遠從荷蘭治臺時期已留有資料，但是各地水利開發情況各有差異。大致而言，荷治時期東印度公司受荷蘭政府委任統治，為達成其商業目的，乃大量招募漢人至臺開墾。荷蘭人在土地經營方面，採王田制度，水利工程如陂、塘、隄、圳之費，皆由其資給，並給耕牛、農具、種籽等，以獎勵開發。彼時水利工程的代表為荷蘭堰，即在水流和緩、地盤軟弱而缺少卵石的河川，設置竹椿、簣子（竹廉），再填以草土，類似我國之梢土，謂之「草埤」。不過此草埤遇洪水時，容易流失。《臺灣府志》載：「參若埤，在文賢里。自紅毛時，有王姓名參若者，築以儲水灌田，遂號為參若埤云。」（註三四）應為此類草埤。此外荷治時期另一重要水資源應用，為井之開鑿，以供生活飲用及灌溉。《諸羅縣志》所記：「紅毛井，在縣署之左，開自荷蘭，因以名，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洌於他井。相傳居民汲飲是井，則不犯疫癘。正式竊據時，有吳智武鎮守斯地，重修之。」（註三五）又記：「龍目井，在大雞籠山之麓，下臨大海，四周斥鹵；泉湧如珠，噴地而起，獨甘洌冠於全臺，不知用自何時，大約荷蘭所浚也。」（註三六）上列所記之井可能為飲用井，亦有鑿井供飲用及灌溉者，《臺灣志略》載云：（註三七）

兵馬營井，在寧南坊，泉淡而甘，甲於諸井，紅毛時鑿以灌園者。偽鄭駐馬兵於此，故名。

註三：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79。

註三四：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水利，頁44。

註三五：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頁285。

註三六：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頁285。

註三七：李元春，《臺灣志略》，勝蹟條。

漢人開拓.tpf-14 7/9/2004 11:14:57

> 烏鬼井，在鎮北坊，水源極盛，雖旱不竭。烏鬼，番國名，紅毛奴也。

至明鄭之時，為增加臺灣糧食的供給，獎勵農業生產，實施寓兵於農的「屯田政策」，開闢出營盤田。其墾殖因以臺南為中心，因此南部地區甚多埤圳，如安平一帶的承天潭、公爺陂、弼衣潭等。明鄭時代的嘉南平原，其埤圳數量已較荷治時期增加許多，然而僅官佃之田畝屬水田，文武官之田地則屬陸地荒埔，仍為看天田。（註六）

荷治及鄭氏時期，開墾重心偏在臺灣南部地區，漢人雖已至大甲附近，但仍未進入本鄉活動，先住民平埔族的耕作仍以旱田耕作為主，尚無築埤圳以行灌溉的記錄。本鄉水資源的應用要等到漢人進入之後，才逐漸利用泉水及埤圳灌溉。

從臺灣的氣候及地形而言，水資源的應用相當不容易。由於受到氣候影響，全年的雨水量分配不均，水源缺乏，故《鳳山縣志》云：

> 邑治田土，多乏水源；淋雨則溢，旱則涸。故相度地勢之下者，築堤瀦水，或截溪流，均曰陂。（註七）

明鄭時期資力與勞力均不足，無法興建較大的水利工程。另一方面耕作技術粗放，地力不能持久，時常要轉地耕種，大規模固定性的水利設施在經營上亦不合算，故大多採取比較簡便的築堤貯水方式。（註三）清代康熙中葉以後，諸羅縣令周鍾瑄採取開放態度以捐助錢穀方式帶頭助民開築埤圳，掀起了臺灣農業開發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從此開始水源的利用型態；由原先的雨水與泉水為主，改變為以溪水與河流為主，這也是臺灣水資源開發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變。（註三）大致而言，臺灣各地水圳的修築，皆賴民間力量興修，完全沒有由官方獨力出資興修者。清代臺灣民間投資興築埤圳的模式，大概可分八種：□獨資開鑿者，□合夥投資開鑿者，□業佃鳩資合築者，□全莊眾業佃田甲攤分合築者，□眾佃合築者，□官民合築者，□漢人與平埔族合作開築者，□平埔族開鑿者等。（註三）此後直到清末，臺灣各地的埤圳修築越來越盛，其管理與營運的模式也漸定型，圳主與引水人的權利義務關係也漸明確。（註三）

臺灣埤圳的修築，早期主要以泉水及井水為主，溪水的利用較晚。這種水利利用的進程，也在本鄉水資源的利用上出現。本鄉北臨大安溪，南界大甲溪，過去屬於大甲堡轄下。大甲地區，尤其是大安溪及大甲溪兩流域間的水利事業，與本鄉關係密切。就兩流域間的水利利用而言，清代大甲地區水利工程的興建，早

註六：有關荷蘭的草埤及明鄭的水利工程特性，可參見劉長齡，〈臺灣水資源早期發展之歷程—荷據明鄭時期〉，《臺灣文獻》49卷3期（民國八十七年），頁7-20。

註七：陳文達，《鳳山縣志》（臺文叢第一二四種，民國五十年），卷二規制水利，頁29。

註二：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87。

註三：蔡志展，〈明清臺灣的水源開發〉，《臺灣文獻》49卷3期（民國八十七年），頁27。

註三：有關清代埤圳開發的模式以及其後的影響，參見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臺灣文獻》36卷2期（民國八十三年），頁107-150。

註三：有關清代水利事業的經營與管理，參見陳鴻圖，〈清代臺灣水利事業的經營〉，《臺灣文獻》49卷3期（民國八十七年），頁75-82。

漢人開拓.tpf-15 7/9/2004 11:14:57

在雍正年間即展開。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墾民相繼開發大甲溪下游之五福圳，灌溉清水一帶沿海平原，並逐漸擴及大甲、大安、及較靠內面的外埔、后里等地。（註廿四）從康熙年間漢人入墾本鄉，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大甲堡王文清興建虎頭大圳，從本鄉水尾庄引入大甲溪水，開始有了灌溉水渠。（註廿五）此虎頭大圳，到日治時期經整修後改為虎眼大圳，並有虎眼一圳與虎眼二圳等幹圳。此圳自本鄉水尾庄引大甲溪水灌溉，並自同堡的崁仔腳庄引金錠泉連接，本、支流合計延長五里，灌溉面積達一、二七八甲，其幹圳虎眼一圳與二圳皆在大甲西北岸，且為由東往西走向。（註廿六）此外，還有幾處較大型埤圳，如同治年間的九張犁圳利用大安溪水，從本鄉的廍子引水，灌溉九張犁（今大甲鎮大白、孟春二里）、樹子腳、刺子埔、下五里牌（今大甲鎮融泉里一部分）等地，灌溉面積達三五〇甲。（註廿七）光緒年間，興豐疇在內外埔開築的北圳等（見下列給單）。地方傳言板橋林家曾到此地開圳，號稱欽差圳，在林江漢所在地及馬鳴村各開鑿了一條圳，但後來並不成功。（註廿八）

興豐疇開築北圳給單（註廿九）

圳主興豐疇為給單事。據大甲磽仔腳內外埔各業主立約，公請本圳主糾集鉅資，興開內外埔北圳貳條，約定出水後，每埔一甲，情願分與本圳主得四成，以酬還工本鉅費。倘業主來歷不明或互相爭執，業主自行抵當。本圳主照章就地抽得四成，其六成給與應得之業主承管。不得因業主相爭，有礙圳主四成之地。今丈明上天井竹圍仔圳業主興豐疇黃許記界內埔第壹甲參分□釐正，除本圳主應得四成，〇甲五分□釐正外，尚有六成埔地，〇甲八分□正。炤其界址，東至車路為界，西至黃三為界，南至車路□溝為界，北至車路為界，應行立單給還業主承管此照。

光緒十九年六月〇日給　（印記）

雖然本鄉於清代已有若干較大型埤圳的修築，但是從部分文獻資料看來，清代本地的水資源利用，其灌溉水源有許多地區仍仰賴泉水或井水。《諸羅縣志》對各種水利工程略有註語，其記：「凡築堤瀦水灌田，謂之陂；或決山泉、或導溪流，遠者數十里、近亦數里。不用築堤，疏鑿溪泉引以灌田，謂之圳；遠者七、八里，近亦三、四里。地形深奧，源泉四出，任以桔槔，用資灌溉，謂之湖（或謂之潭）：此皆旱而不憂其涸者也。又有就地勢之卑下，築堤以積雨水，曰涸死陂；小旱亦資其利，久則涸矣。」（註卅）。這些陂、圳等水利設施的開築，很多都是業佃戶自行挖掘的小型埤圳，如道光元年的永耕磧地銀字載大甲東社番搭胰抵巳、

註廿四：參見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八年），頁54-83；臺灣省水利局編印，《臺灣省水利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專輯》（臺中：編者，民國七十六年），頁92。

註廿五：見蔡志展，〈明清臺灣的水源開發〉，頁43。

註廿六：參見《大甲鄉土の概觀（昭和八年）》，（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34；賴志彰，〈臺中水資源〉，《臺中文獻》5期（民國八十六年），頁15-16。

註廿七：《大甲鄉土の概觀》，頁39-40；賴志彰，〈臺中水資源〉，頁16。

註廿八：見〈外埔鄉志第一次耆老座談會議記錄〉，頁9-10。

註廿九：〈興豐疇給單〉，民俗收藏家郭雙富先生藏。

註卅：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水利，頁34。

漢人開拓.tpf-16 7/9/2004 11:14:57

夫四老白毛出賭座落於土名七張犁庄田地一塊，並帶圳水灌溉。（註四二）此時當地已有圳水灌溉，應為原番主所修築的小型私人埤圳。此外，清代本鄉的圳水來源還有雨水（溝水）、泉水、井水等，而引溪水灌溉則技術較高，其規模也較大。茲將相關地契資料臚列如下。

地契一：（註四三）

立開墾盡根找洗契字大甲東社番那吭無牙，今有承祖父遺下埔園一所並水田一小段，合共壹處，坐落土名在番社尾。東路下走至車路為界，西至六觀圖記園為界，南至水溝為界，北至交蚋米厘園為界，四至界址明白。原帶社內大溝水通流充足，歷年配納大租粟壹石伍斗正。今因乏銀費用，先問社中番親伯叔兄弟侄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漢人賴阿海（蒼兄弟出首承墾，三面議定，時值墾價銀捌拾肆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親交收足訖，其園併田隨即踏明交付墾主前去耕作掌管，任從其便，自備血本開闢成田，開碑作圳，架造築墳，哉插竹木花菓等物，永為己業，不敢阻噹。自此一墾千休，割藤永斷，寸土不留，日後子孫不敢言找言贖，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園及田係那吭承祖父物業與別番親人等無干，亦無上手來歷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係那吭自出首一力抵當，不干墾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出開墾盡根找洗字壹紙，並帶上手虎豹厘永佃字壹紙，共貳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開墾盡根找洗契面銀捌拾肆大員正足訖再炤

代筆人東永昌

場見人（印記）　　為中人（印記）

同治拾貳年四月　日立開墾盡根找洗契字番那吭無牙（印記）

上文所謂大溝水，通常為一具排水兼具灌溉的溝渠，也就是其水源性質是屬於溝泉水的灌溉水源，此種水源至臺灣光復後仍然存在，如本鄉的水美湖底溝、三崁坑溝，皆屬此類。

地契二：（註四三）

立開永耕田契字，大甲東社番婦阿蕉添（姪東阿文，有承祖父遺下水田壹段，坐落土名在番社前大小陸坵，東至麟生田，西至車路，南至溝，北至蚋蚋老田，四至界址，俱各明白為界。原帶麟生水尾，灌溉充足，年配納番主大租粟貳斗正，今因乏銀費用，願將此水田出墾，先問社中番親俱各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大甲東社庄高媽願觀出首承墾，當日仝中三面言議時值墾田價銀柒拾壹大員正。銀即日仝中親收足訖，其田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高媽願觀兄弟前去掌管，永為己業，日後阿蕉添（姪東阿文以及子孫不得言我，亦不得言贖滋事，保此田係阿蕉添（東阿文承祖父物業，與別房番親叔兄弟姪無干，亦吳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為礙，如有不明，阿文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和立開墾永耕田契字一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開墾永耕田契字面價銀柒拾壹大員正足訖又炤

批明其大租粟貳斗系早季割單完納不得短欠再炤

註四二：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47。
註四三：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66。
註四三：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45。

漢人開拓.tpf-17 7/9/2004 11:14:57

代筆人陳仕衡
中人（印記）
在場人（印記）
知見人（印記）
日立開墾永耕田契字番東阿文
光緒柒年拾月

此田後來又轉賣給番社尾賴阿聰，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此水田的圳水來源，在後來高媽願及高生傳所同立的杜賣盡根田契字中，談得更清楚，其言：「……等水田一段坐落土名址在番社尾，東至麟生田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水溝為界，北至蚋蚋老田為界，四至界址明白，原帶麟生水尾併帶南畔溝泉水及田尾水俱通流滲足。歷年配納番主東有文大租粟貳斗正，割單完納。今因乏銀……托中引就向與番社尾賴阿聰觀出首承買……光緒拾貳年拾月」。（註四）也就是說此水田除了麟生水尾水之外，另有井泉水、溝泉水。如大甲東社人東來旺六所賣出的水田，其水源即為井泉水。（見地契三）

地契三：（註四五）

立給開墾永耕盡根田契字大甲東社番東來旺六觀，有承祖父淡眉蔴荖遺下水田壹段，併帶山坪樹木在內，坐落土名址在番社尾對面車路下。東至車路為界，西至咬難頭番田為界，南透山坪頂至路為界，北至大溝為界，四至界址，登載分明，原帶六分坪腳井泉水及溝內柴鵠井泉水頂下濫泉水，各通流灌溉滲足，別份不得混爭。歷年配納大租谷貳石正。今因乏銀別創，愿將此水田山坪樹木一切盡根給出開墾永耕。先問盡社中親房眾番人等，俱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番社尾漢人賴阿海觀阿聰觀兄弟，仝出首承墾。當日仝中三面言定，時值盡根開墾田價佛銀貳百捌拾大員正。銀即日仝中親收足訖，隨將水田山坪樹木泉水一概照界踏明，交付銀主賴阿海觀阿聰觀兄弟，仝前去掌管佃耕作，任便栽種樹木永為己業，自此來旺六觀一墾出千休，永遠杜絕葛藤，永斷日後來旺六觀以及子孫等永不敢言及添貼找贖，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水田山坪樹木係來旺六觀承祖父遺下之業，與社中親房眾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及來歷不明為礙，如有不明等情，來旺六觀自應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仁義交關，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合立給開墾永耕盡根田契字壹紙付執永遠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開墾盡根田契字內佛銀貳百捌拾大員正，足訖再炤。

批明此田東畔有佩帶柯家置田在車路頂是賴家自開埤湜壹口泉水，永遠通流滲溉此田足用不得廢塞。歷年應納柯家水租谷參石正。聲明批炤。

代筆人郭允預
知見（印記）　胞叔東荖巳　為中番業戶（印記）
在場母親東葛氏
光緒七年參月　日立給開墾永耕盡根田契字番東來旺六觀

這種利用溝井泉水及水圳水的情況，在本鄉相當常見，一直

註四：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72。
註四五：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頁169。

漢人開拓.tpf-18 7/9/2004 11:14:57

到臺灣光復以後，本鄉的水圳除了利用大甲溪水的虎眼大圳以及利用大安溪水的后里圳外，許多的小水圳仍然是利用溝泉水，或併用水尾水及溝泉水，如高園圳及城**廍**圳，此為本鄉水圳的重要特色。

至於目前本鄉灌溉面積最大的后里圳，以及其他小型的灌溉工程，其修築時間皆已進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水利事業上，與清政府的態度有極大的不同，為達到發展臺灣農業的目的，對於灌溉排水等水利工程相當重視，官方對后里圳的興建，便是其中之一。（註四）此種特性使此種水利工程，已脫離漢人開拓的過程，詳見建設志水利部分。

大致而言，本鄉早期為平埔族大甲東社人的活動地，從康熙年間漢人入墾開始，漢人或租賺大甲東社人之土地，或透過購買、巧取豪奪等方式，逐漸讓本鄉進入開發的狀態。漢人進入之後，對水利設施的開拓，無疑地比之平埔族人更為積極；讓本鄉的旱地耕作得以水田化。雖然本鄉較大規模的水利興修，如后里圳的開築，則要到日治時期才開始，然而清代漢人在本鄉的開墾，已經讓本鄉進入稻作農業文明。

註四：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編者，1997），頁78。

漢人開拓.tpf-19 7/9/2004 11:14:57

參考文獻及引用書目

壹、中文

一、史料文獻

1. 外埔鄉公所，《外埔鄉志第二次耆老座談會議記錄》（臺中：外埔鄉公所，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2.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
3. 洪麗完主編，《外埔鄉藏古文書專輯》（臺中：外埔鄉公所，民國九十一年）。
4.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七十四年翻印）。
5.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文叢第一二一種，民國五十三年）。
6.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
7.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文叢第二十四種，民國四十七年）。
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文叢第五十五種，民國五十一年）。
9.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一年）。
10.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文叢第四十四種，（民國四十八年）。
11.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文叢第六十五種，（民國四十九年）。
12.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文叢第一二四種，（民國五十年）。
13.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文叢第一七二種，（民國五十二年）。
14.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一年）。
15. 楊英，《從征實錄》，臺文叢第三十二種，（民國四十七年）。
16.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

二、近人專著

1. 林衡道口述，楊博鴻整理，《鯤島探源—臺灣各鄉鎮區的歷史與民俗》（臺北：稻田，民國八十五年）。
2.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
3. 張勝彥主編，《臺中縣志》（豐原：臺中縣政府，民國七十八年）。
4. 陳正祥，《臺灣地名手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三十八年）。
5. 陳正祥，《臺灣地誌》（民國四十八年）（臺北：南天，民國八十二年）。
6.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
7. 劉還月，《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民國八十九年）。
8. 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八年）。
9. 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

漢人開拓.tpf-20 7/9/2004 11:14:57

10.臺灣省水利局編印，《臺灣省水利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專輯》（臺中：編者，民國七十六年）。
11.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臺中縣大甲溪流域開發史》（豐原：編者，民國七十八年）。
12.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一輯）》（豐原：編者，民國八十三年）。
13.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編者，民國八十六年）。
14.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北：編者，民國七十七年）。

三、期刊論文

1.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臺灣文獻》36卷2期（民國七十三年），頁107-150。
2.洪麗完，〈大安、大度兩溪間墾拓史研究（一六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43卷3期（民國八十一年），頁165-259。
3.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佬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論文集》（臺北：編著，民國七十七年），頁133—185。
4.張勝彥，〈清代漢人土地所有型態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報》4期（民國七十年），頁49-76。
5.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民國六十八年），頁255-293。
6.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臺灣文獻》31卷4期，32卷1期。
7.陳秋坤，〈番契、番大租、原住民的傳統土地權利〉，《歷史月刊》10期（民國七十七年），頁122-125。
8.陳鴻圖，〈清代臺灣水利事業的經營〉，《臺灣文獻》49卷3期（民國八十七年），頁75-82。
9.程士毅，〈軍工匠人與臺灣中部的開發問題〉，《臺灣風物》44卷3期（民國八十三年），頁13-49。
10.黃富三，〈清代臺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月刊》11卷2期（民國七十年），頁26-92。
11.黃富三，〈清代臺灣的土地問題〉，《食貨月刊》4卷3期（民國六十三年），頁77-88。
12.黃富三、翁佳音，〈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見《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頁117-152。
13.楊緒賢，〈中部的開發〉，《歷史月刊》15期（民國七十八年），頁115-122。
14.溫振華，〈清代臺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師大歷史學報》11期（民國七十二年），頁43-95。
15.詹素娟，〈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探討〉，《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195-227。
16.劉長齡，〈臺灣水資源早期發展之歷程—荷據明鄭時期〉，《臺灣文獻》49卷3期（民國八十七年），頁7-20。

漢人開拓.tpf-21 7/9/2004 11:14:57

貳、日文

一、近人專著

1. 大久保源吾，《臺中州の水利事業と中心人物》（臺北：臺灣河川水利問題研究會，昭和十四年）
2. 大甲公學校編，《大甲鄉土の概觀》（昭和八年）（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
3. 伊能嘉矩編，《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明治四十二年）。
4.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年）。
5. 杉目妙光，《臺中州鄉土地誌》（臺北：盛文社，昭和九年）。
6.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帕米爾，民國七十四年）。

二、期刊論文

1. 〈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臺灣慣習記事》1 卷下 12 期（明治三十四年），頁 1-19；2 卷 2 期（明治三十五年），頁 75-78。
2.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 卷 2 期（民國七十九年），頁 89-103。
3. 關口隆正，〈臺中地方移住民史〉，《臺灣慣習記事》1 卷上 6 期（明治三十四年），頁 1-24；1 卷下 7 期，（明治三十四年），頁 1-20；1 卷下 8 期（明治三十四年），頁 1-12。

漢人開拓.tpf-22 7/9/2004 11:14:57